



高 教 动 态

(半月版)

2014年第8期
(总第33期)

嘉兴学院
规划与评估处 编

2014年6月16日

目 录

● 高教时讯

教育部实行目录清单管理.....	1
教育部：招聘不得将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	1
吉大等9所高校章程获教育部核准.....	1
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启动.....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在京揭牌.....	2
把创业、创新、管理和全球业务融入课程.....	2
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专题报告会举行.....	3
浙大百名教授带你“逛”专业.....	3
哈尔滨工程大学近千万元奖励教学.....	4
中国人民大学启动“百名海归挂职计划”.....	4
天津大学：每年设亿元“种子基金”支持师生创业.....	4
中国矿业大学：聘5名学生当校务参事.....	5
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	5
南开大学向高中生开放35门公选课.....	5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让思政课告别“枯燥干巴”.....	6
广西允许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之间双向转学.....	6
浙江省高校双语（全英文）教学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研讨会召开..	6

● 决策参考

教育部关于公开征求对《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7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新阶段及其主要特征.....	9
黄达人：准确理解本科应用转型的内涵.....	13
大学招生：看世界银行如何“把脉”.....	18

● 高教视点

高校改革：好政策要执行到位.....	21
“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实与质.....	24
高校要主动提高驾驭市场能力.....	27
制度正反“双向”确保大学良性发展.....	30

● 他山之石

对话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校内改革并非简单放权.....	32
暨南大学“三个一”行动计划搅活本科教学.....	36
抓住学校发展的牛鼻子——渤海大学校长杨延东谈教学改革..	38

● 国际视野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十大趋势.....	42
---------------------	----



高教时讯

教育部实行目录清单管理

为切实解决评审多、评估多、检查多等地方和学校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教育部日前出台《关于改进评审评估评价和检查工作的若干意见》，改进项目评审、教育评估、人才评价和检查工作，实行目录清单管理。

教育部要求精简评审、评估、评价和检查事项，对于不符合实际需要、作用不大、效果不明显或者较长时间没有实际开展的三评事项，要予以取消；对于内容交叉重复或者关联度高的三评事项，要予以整合。统筹各种常规性和临时性检查，大力精简三评和检查事项，对同一单位的同一事项，一般不搞年年评年年查。清理后，三评事项原则上要减少 1/3 以上。

精简工作完成后，对于确需保留的三评和检查事项，要编制目录清单，经过部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在教育部门户网站予以公开。凡已经取消、下放不在目录清单内的三评事项，一律不得再开展。需要新增的，要对其必要性、可行性作充分论证并经部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实施三评和检查工作，不得收费。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06月13日12版）

教育部：招聘不得将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

教育部官网日前发布 2014 年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新政策，其中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就业公平。用人单位招聘不得设置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歧视性条件，不得将院校作为限制性条件。省会及以下城市用人单位招聘应届毕业生不得将户籍作为限制性条件。

新政策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消除高校毕业生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单位之间流动就业的制度性障碍。省会及以下城市要放开对吸收高校毕业生落户的限制，简化有关手续，应届毕业生凭《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以及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劳动（聘用）合同办理落户手续；非应届毕业生凭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聘用）合同和《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办理落户手续。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6月13日06版）

吉大等 9 所高校章程获教育部核准

近日，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章程核准书，核准了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和西南大学等 9 所高校的章程。这是教育部继核准中国人民大学等 6 所高校章程后，核准的第二批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章程。

此次教育部核准的 9 所高校章程，在借鉴第一批核准的 6 所高校章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



践和特点，突出了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要求，在健全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治理体系框架、重视加强院系等学术组织的运行规则与治理体系、健全校内民主监督机制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

据介绍，目前，章程建设受到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绝大多数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章程的起草工作，正在进一步履行校内征求意见和审核程序，一部分高校已经向教育部提交了核准申请。教育部正在集中进行核准，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陆续予以核准并公布。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06月05日15版）

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启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消息称，为引领和支持更多的大学生创业，人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工商总局、共青团中央日前发出通知，启动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通知提出，促进大学生创业要坚持政府政策支持与创业者努力相结合，合理运用政府公共资源，充分动员社会其他资源，激发大学生创新活力，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使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进一步增强，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大学生勇于创业的机制基本形成，大学生创业的规模、比例继续得到扩大和提高，力争实现2014～2017年引领80万大学生创业的预期目标。

通知强调，各地有关部门要从普及创业教育、加强创业培训、提供工商登记和银行开户便利、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提供创业经营场所支持、加强创业公共服务六个方面综合施策，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和服务。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6月02日02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在京揭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签约暨揭牌仪式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签署了设立UNESCO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的协议。

据介绍，该中心将是UNESCO下设的二类中心，是一个国际性、综合性工程科学与应用技术知识中心，其建设目标是联盟全球工程科技机构，整合各类工程科技数字资源，建立公共数据服务平台和协同服务环境，合作共建各种专业知识服务系统，面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广大工程科技工作者提供咨询、科研、教育等知识服务，协助UNESCO履行其宗旨并支持其各种行动计划。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6月03日06版）

大学工程科技教育：

把创业、创新、管理和全球业务融入课程



近几个世纪以来，工程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益处显而易见。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今天，大学应如何发展以及培养工程科技专业人才？

6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总裁兼校长基思·奥尼斯（Sir Keith O' Nions）作了《工程铸就未来：大学与教育》的发言，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国的1500多名与会专家。他认为，大学在工程科技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各国设有工程科技专业的大学里，无论理工科还是医科，其教学的要求和方式都在发生着改变。大学应打造一个将创业、创新、管理和全球业务融入工程技术课程的学习环境，学科设置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基思·奥尼斯介绍，帝国理工学院提供跨学科的教育，规划和正在建设新的校区和创新区，让每一位学生接受正规的工程教育、医学实践，以及参与当地的产业实践，鼓励学生在学习中能够紧密结合未来的职业发展趋向。

基思·奥尼斯说，在学生完成基础学科必须达到的要求后，学校可以为学生加入研究团队、在相关公司完成工作、在其他国家参加工作等方面创造条件。此外，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学生还应该接触创新和创业的精神，对医学、生物、管理和商业都要有选择地涉及。

他归纳指出，把新发现和新知识商业化，产生经济效益，是激励科研人员进行创新的重要动力。大学科研也应该满足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促进公共福利，另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6月03日06版）

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专题报告会举行

近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北京毕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办的“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专题报告会”在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出席了本次会议并致辞。

瞿振元认为，MOOC作为当前教育革命和变革当中的代表，是多个领域共同努力的结果，面对国际教育变革的浪潮，如何保持它的自主性，除了要处理好向外看和向内看的关系，还要处理好线上和线下的关系，研究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育改革问题、教学改革问题，不仅要把当下的工作做好还要了解新的教育手段、方法给教学带来的变化，着手现在，放眼未来，创造更好的教与学的环境。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陆国栋教授及南京大学网络化学习研究所所长桑新民作专题报告。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的近150位管理人员和教师参加了报告会。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06月11日）

浙大百名教授带你“逛”专业

浙江大学的120多位教授近日共同撰写了《教授带你“逛”专业》一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各自专业并给出建议，为面临选择的未来大学生们提供一份易懂实用的大学专业“说明书”。

以往招生介绍中，学科专业介绍多用专业术语表述。浙江大学在调研的基础上搜集了高考生最想了解的8个专业问题，包括：该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是什么，选择该专业需具备什么特质，



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等。针对这些问题，该校组织了34个院系、125个本科专业的一流教授，撰写专业的“导游词”，提供权威信息。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06月13日12版）

哈尔滨工程大学近千万元奖励教学

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2013年度教学评价结果揭晓，近600位教师和一批先进集体受到嘉奖。这是该校自2011年以来第4次大规模进行教学奖励，奖励总金额达927.69万元。

该校副校长杨德森表示，以“扩大教师奖励范围、加大奖励额度”为思路的教学评价工作，已成为哈工程一项常规性工作。

该校校长刘志刚在会议上总结，该奖励举措营造了教师重视教学、倾心教学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学校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并称，该校的教学监控与评价体系已初步形成。教学评价及表彰工作以优劳优酬为原则，是该校新一轮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05月31日03版）

中国人民大学启动“百名海归挂职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12日正式启动“百名海归挂职计划”。首批30名海外留学归国教师将派往16个合作单位，分别以联合培养博士后、挂职行政岗位、受聘经济学家或研究员等形式开展实践锻炼。

“百名海归挂职计划”包括海归学术带头人挂职实践和青年海归教师挂职锻炼两部分，支持对象为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长期海外工作经历的本校在职在岗海外归国教师。据了解，首批教师挂职期间的研究课题和工作内容都是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领域，包括反垄断与竞争政策、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传播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说，希望海归教师在实践中“接地气”，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学以致用。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6月13日06版）

天津大学：每年设亿元“种子基金”支持师生创业

一项试图破解科技成果转换难题的试验将在天津大学展开。该校近日与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签署协议，将联合推出“新英计划”，未来10年每年引入1亿元的“种子基金”，对师生的项目开展持股孵化工作。天津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将在校内发掘那些有产业化前景、有市场、有技术含量的专利、项目或团队。目前，该校年均申请专利2000多件，批准的专利为600~700件，其中90%以上是发明专利，具有转化为生产力的潜力。天津大学希望在校内搭建一个适合创新创业的“大棚”，为师生提供合适的“土壤”和“温度”。

根据协议，双方还将共建创新创业学院，通过“产教结合、工学结合”的形式合作办学。李家俊说，在探索成果转化的同时，天大也希望找到一条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路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06月08日）



中国矿业大学：聘 5 名学生当校务参事

日前，中国矿业大学 5 名学生从校长葛世荣手里接过了校务参事的聘任证书，正式开始“参政议政”的校园新生活。

据了解，中国矿业大学给予学生校务参事多项工作“优先权”，如可以随时约见校领导，直接向校领导反映意见建议并有权及时获得主要校领导的批阅、回复，拥有登录学校办公系统调阅相关文件的权限，以及随时向有关部门就相关事务进行咨询、质询等。

中国矿业大学学工处处长黄军利介绍说，此次学生参事经过了多次筛选，3 月底，学校发布了选聘通知，通知中规定，学生在自愿基础上可通过校级主要学生组织、各学院进行推荐，学生也可以自愿申报，但必须有两名教师推荐，最终有 43 名本科生，19 名研究生成为候选人。4 月份，通过笔试、面试的两轮严格公开选拔，最终文法学院钱悦菡、管理学院程铄博、材料学院朱士泽 3 名本科生及资源学院王文国、文法学院陈文斐两名研究生脱颖而出。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 年 6 月 14 日 2 版)

中国科学院大学开设“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首次“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方向人才培养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表示，该专业应发挥中科院相关研究所在大数据领域的优势，把人才培养与科研优势结合起来，让有条件的学生参与到研究所大数据技术及应用的科研实践中来。

该专业方向具体实施单位、国科大工程管理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于华介绍说，他们将逐步开展与金融、电信、气象、电子商务、科学计算、物流、遥感、航天等领域的合作，把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切实为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优质教育服务。

据了解，国科大将面向科研发展及产业实践，培养复合型大数据人才。不同于普通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该方向首先瞄准具有一定行业背景的在职人员，通过整合中科院及合作伙伴在大数据技术及应用领域的优质资源，力争打造具有中科院特色和优势的专业方向。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4-06-03 第 4 版)

南开大学向高中生开放 35 门公选课

“就业与创业实训”“漫画艺术概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在 2014 年夏季学期来临之际，南开大学挑选了 35 门公共选修课向天津高中生免费开放。

今年南开大学夏季学期将从 6 月 23 日持续到 7 月 20 日，在专门制作的“南开大学夏季学期公共选修课高中生选课系统”上，学生注册后可以选课、退课，并进行网上评教、查询成绩等。每名高中生限选 2 门课程。此外，应届高中毕业生选修课程并考核通过后，将来如果被南开大学录取，学校将给予学分认定并记入学业成绩。

(来源：《人民日报》2014 年 06 月 04 日 08 版)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让思政课告别“枯燥干巴”

为了改变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枯燥干巴”的成见，让他们乐于学习思政课，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系把专业建设根植于湘中历史文化土壤，效果良好。

该系主任游训龙说，湘中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曾国藩、陈天华、成仿吾等人的重要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做人与做官、励志与诚信教育等思想。

近年来，该系探索出了一条以“土”为特色的思政教育之路，首先，对专业培养目标和特色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将“近现代湘中历史人物思想讲座”列入必修课，并把实践教学置于突出地位；其次，办好内刊《湘中历史论坛》，聘请教师担任主编，学生担任编辑，每年出四期。

该系思政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实现了良性互动。2010年8月，该专业被评为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2011年，思政教育学科又被评为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12日3版）

广西允许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之间双向转学

广西教育厅今天印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实施办法》，首次提出允许学生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之间双向转学。

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广西普通高中学生学籍管理，提高学籍管理水平、规范办学行为。学生学籍管理实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学校实施”的管理体制。对学生的入学、注册；考勤、评价；升级、留级；休学、复学；转学；退学、借读；奖励、处分；毕业、结业、肄业等都作出明确规定。

实施办法对转学作了新规定，允许学生在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之间双向转学。高中学生可转入广西任意一所中职校，中职学生限转入中考所在设区市的高中。转学需经双方学校及县（市、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确认，涉及广西直属中职校的需经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确认。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12日1版）

浙江省高校双语（全英文）教学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研讨会召开

浙江省高校双语（全英文）教学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研讨会近日在浙江理工大学召开。会议共设教学观摩、主题发言、自由发言、大会总结4个环节，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作了大会交流。

会议旨在推动我省高校课堂教学创新与改革，提升教师双语（全英文）教学能力和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省30所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务处工作人员和双语（全英文）授课教师共120余人参加。

（来源：浙江省教育厅 2014-06-13）



决策参考

教育部关于公开征求对《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理事会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我部研究起草了《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 登陆中国政府法制网(网址: <http://www.chinalaw.gov.cn>), 通过网站首页左侧的《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2. 登陆教育部网站(网址: <http://www.moe.gov.cn>), 通过首页左侧“征求意见”栏提出意见。
3. 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 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5 号教育部法制办(邮编: 100816)
4.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fzb@moe.edu.cn。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14 年 7 月 5 日。

教育部
2014 年 6 月 5 日

附件:

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促进和规范高等学校理事会建设,健全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国家相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理事会,系指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根据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需要,设立的由办学相关方面代表参加,支持学校发展的咨询议事与监督机构;是高等学校实施科学决策、民主监督,促进社会参与的重要治理主体和组织形式。高等学校使用董事会、管委会等名称建立的相关机构适用本规程。

第三条 高等学校应当依据本规程建立并完善理事会制度,制订理事会章程,明确理事会在学校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职能,增强理事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健全理事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合作机制;为理事会及其成员了解和参与学校相关事务提供条件保障和工作便利。

第四条 高等学校应当结合实际,在以下事项上充分发挥理事会的作用:

(一) 加强社会合作,提升学校与地方、企业事业组织合作的水平与质量,推动协同创新,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科研开发、学生就业、实习实践、师资培养等方面,与社会相关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二) 扩大决策民主,保障学校办学定位、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学科建设、改革措施及其他重大事项的决策,能够充分听取和反映各相关方面意见;

(三) 争取办学资源,拓展学校资金来源渠道,丰富社会参与和支持高校办学的方式与途径,探索、深化办学体制改革;

(四) 接受社会监督,健全对办学质量与效益的监督、评价机制,提升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第五条 理事会可以由以下人员组成：

- (一) 高等学校举办者、政府主管部门、共建单位的代表；
- (二) 学校相关负责人，学术委员会及相关学术组织负责人，教师、学生代表；
- (三) 支持学校办学与发展的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等理事单位的代表；
- (四) 杰出校友、社会知名人士、校外著名专家等关心学校发展的各方面代表；
- (五) 学校邀请的其他代表。

第六条 理事会组成人员一般不少于 21 人，可分为职务理事和个人理事。职务理事由相关部门或者理事单位委派；理事单位和个人理事由学校指定机构推荐或者相关组织推选。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可以确定为当然理事。根据理事会组成规模及履行职能的需要，可以设立常务理事会。

第七条 理事会每届任期一般为 5 年，理事可以连任。理事会可设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若干名；理事长可由校长或者学校党委会提名，由理事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八条 理事会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 (一) 审议通过理事会章程、章程修订案；
- (二) 决定理事的增补或者退出；
- (三) 就学校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年度预决算报告、重大改革举措、学校章程拟定或修订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咨询或参与审议；
- (四) 审议学校开展社会合作、校企合作、协同创新的整体方案及重要协议等，支持学校开展社会服务；
- (五) 研究、审议学校面向社会筹措资金、整合资源的目标、方式、途径等，监督筹措资金的使用；
- (六) 评议学校办学质量，就学校办学特色与质量进行评估，提出建议；
- (七) 学校章程规定或者学校委托的其他职能。

第九条 理事会应当建立例会制度，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应学校要求，也可召开专题会议，或者设立若干专门小组负责相关具体事务。

第十条 理事会会议应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就会议议题充分讨论，形成共识；可以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重大事项或者重要决议。理事会成员的投票权及投票的权重、表决方式等，可以经协商在理事会章程中约定。

第十一条 理事会可设秘书处，负责安排理事会会议，联系理事会成员，处理理事会的日常事务等。

第十二条 理事会组织、职责及运行的具体规则，会议制度，议事规则，理事的权利义务、产生办法等，应当通过理事会章程予以规定。理事会章程经理事会全体会议批准后生效。

第十三条 高等学校应当向社会公布理事会组成及章程。理事会应当主动公开相关信息及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受学校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四条 本规程自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已设立理事会或相关机构的高等学校，其组成或者职责与本规程不一致的，应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依据本规程予以调整；尚未设立理事会的高等学校，应当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理事会的组建。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新阶段及其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论述，不仅给我们提出了改革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与深化改革的思路，而且从整体上将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充分认识这种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深刻内涵与时代要求，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现实依据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的现实根据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教育地位的变化。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生重大变化。《决定》在第十二部分“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中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表述。首先，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这种如此强调和有分量的语言表述教育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其次，在这个部分所涉及的5个领域中，即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教育”超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被摆放在了第一的位置。这种叙述结构上的安排绝不是偶然的，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教育的叙述结构是一致的；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也非常明确指出，“在框架结构上，全会决定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条谋篇布局”。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地位发生了新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获得了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紧迫性，说明教育改革与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和需要有所突破的领域。这意味着在现代中国社会，在关系到人民群众发展与根本利益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已经逐渐、并越来越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因素。

第二，改革逻辑的变化。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决定》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重要领域和主要问题，包括立德树人、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公平、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及以管办评分离为重点的管理体制改革等，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领域和问题的改革发展，已经不仅是能够单纯通过增量而得到解决的问题，而必须对现有的体制与结构进行改革，而这些领域和问题的改革总体上属于一种存量的改革，这也是体现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一种存量的改革反映了一种改革逻辑的变化，即从以往的以发展带动改革，逐渐转变为以改革带动发展。由此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挑战与新要求。与以往增量改革的逻辑比较，存量的改革由于涉及已经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往往在改革的目标和措施上难以形成高度共识，因而可能具有更大的成本，甚至会因为复杂程度高、影响因素多而存在一定的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需要一种“担当”的精神。

第三，主要矛盾的变化。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在逐渐发生变化。《决定》提出，要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改革举措表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然而，这样的改革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变化，不仅仅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也同样对教育改革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改革产生



一定影响，意味着学校改革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将从以往的学校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变为学校与市场之间的矛盾。

根据国际著名学者克拉克的观点，一个国家和社会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与主要矛盾，常常取决于一个结构性的三角形，即国家政府、学术专业及市场。这个三角关系的不同形态，或者不同的相互关系，建构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重要矛盾与特征。所以，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变化，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与政府、教育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出现更加复杂的格局。一方面，政府在义务教育和涉及公共利益的某些教育领域将承担和发挥更加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某些非义务教育和与市场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教育层次、部分或领域，则需要更多地以市场需求为引导，进一步调整与市场的关系。同时，政府对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机制也将更多地与市场相联系。由此，教育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逐渐成为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因此，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即将或开始逐步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并将引起学校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包括改革思路与发展战略的变化。

二、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过程性特征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 30 多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种必然，体现了教育发展规律，与中国整个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

首先，这种新阶段是整个教育改革发展的更加高级和深化的阶段，是在教育持续增长多年以后全面实施改革发展的历史阶段。

完整意义的教育发展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以增加供给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增长的阶段；二是在保持教育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教育资源与机会分配机制的合理性为主要目标和内容的阶段。单纯的教育增长并不等于教育发展，但这种教育增长却是教育发展的起始阶段，是整个教育发展的基础。中国教育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历史也呈现了这样一条轨迹。在改革开放早期，我们实施的是以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教育改革更加重视的是不断扩大教育供给总量，不断增加教育机会，通过扩大增量带动改革和存量的变化。这种模式是必要的也是明智的战略选择。没有总量的扩大便强调机会分配的合理性，其结果只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然而，这种以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种发展模式中，教育资源和机会分配机制的合理性，也就是教育公平的问题往往被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供给的增长遮盖，以至于在教育增长的同时，社会对教育公平的批评也日益增加。因此，按照一般规律，这种以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往往在教育规模和供给总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便会转变为以更加重视和强调教育资源和机会分配机制的合理性，更加强调教育公平为主要特征的全面发展模式。而这种转变的社会基础是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关注和需求已经从单纯的“能上学”转变为“上好学”，进而更加关注优质教育资源与机会的合理分配。这也正是《决定》以如此大的篇幅，具体地论述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历史基础。这正是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其次，这种新阶段不仅表达了整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和新目标，而且反映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新观念，进一步体现了教育的本质，在继续重视教育的经济社会功能的同时，更加强调教育的本体功能。



教育发展的理论通常表现为两种基本观念：一种是所谓教育发展的工具观，指的是一种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教育发展观。在这种工具观中，国家发展教育和个人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例如，人力资本理论就体现了非常典型的教育发展工具观，而且也是近年来主导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在教育发展早期，这种教育发展工具观是主要的发展观，它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另一种则是所谓教育发展的道德观，它强调教育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促进个人的发展，其特点是在教育发展的话语中特别强调和重视个人，包括个人的参与和福利。在这种教育发展的道德观中，教育并不是被看作单纯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工具，而是一种基本人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期，国家往往更加强调教育发展的工具观，重视教育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贡献。这种强调和定位是必要的。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教育发展的道德观往往逐渐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要话语和价值观。强调教育发展的道德观并不否定教育发展的工具观，而是首先肯定教育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应该更加重视教育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决定》把教育作为民生的重要问题，并当作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之一，正是充分肯定了教育发展的道德观，肯定了教育发展对人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也充分肯定了教育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

再其次，这种新的阶段是中国渐进性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节点”，它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性特征。这一“节点”既关系到前一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巩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未来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与水平。

中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如同整个改革一样，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它注重的是改革的平稳性和循序渐进。历史证明，这种改革发展的模式是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和国情的，而且也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这种渐进性的改革发展模式也有它自身问题，即这种改革往往在一定阶段内存在不彻底性，它为了追求稳定和“软着陆”，往往不会直接触及某些深层次的或内在的核心矛盾，而常常以克服某些外在矛盾和困难去缓解矛盾，使得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某些内在矛盾逐渐积累，甚至形成某种潜在的风险或危机。从发展过程的角度看，这种深层次的内在矛盾，或者逐渐积累的某种问题，常常在渐进性发展过程的某个时段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可以认为，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正是到了这样一个过程性的“节点”，表明教育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触碰教育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即制度与体制的问题，由此也需要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理论与智力支持，而这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关键是解放思想

综合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思路，它既是改革发展逻辑和对象的需要，也是由新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所决定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

所谓的综合改革，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结合中国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认识和理解综合改革的思路，我认为它至少具有3个方面的含义，即系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所谓的系统性，指的是从教育的整体来谋划改革的思路，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的基础性，指的是真正抓住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基础性或根本性问题，进而获得治本而不仅是治标的效果；所谓的战略性，指的是必须发现和抓住若干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具体问题深入改革，进而求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



《决定》提出和强调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其本身已经超越了理论与认识的范畴，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尽管教育作为公共领域并没有出现经济领域中的那种分化现象，但不容否定的是，由于历史及利益与资源分配等诸多原因，教育领域也同样存在，甚至是达到一定固化程度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群体。随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分化，教育系统内部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内部的张力日益加强，矛盾不断发展，由此对教育改革的具体目标、措施等产生了各种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意见、理解与要求；教育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本身也在发生分化，对教育改革政策形成了不同的声音。所有这些，使得教育改革的整体系统工程蜕变成一个个局部的、相互隔离的孤立行为，进而极大地制约和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深入和效果。特别是当改革进入到以存量改革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时，这种分割和缺乏合作的局面往往成为深化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困难，并且已经构成了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发展的巨大障碍和阻力，甚至比某些外部因素更具有破坏力。因此，克服和消解教育系统内部各部分与层次之间的各种壁垒和隔阂，从整体上认识和分析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发展的切入点与关键环节，有计划和有步骤地实施教育改革与发展，形成教育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的合力，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非常直接的现实含义。《决定》提出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思路，其目的就是要求教育系统的各个部分和方面，应该将自身改革与发展中的小利益，服从于整个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利益；将本部门改革与发展的小道理，服从于国家教育整体改革与发展的大道理；将本领域改革与发展的小逻辑，服从于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逻辑。

显然，这种综合改革的思路要求我们换视野、换办法、换政策，更重要的是换思想，即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非常准确和中肯地指出：“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他还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的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思想不解放，就跳不出既有观念的束缚；思想不解放，也难以冲破既定体制的框架。这样，综合改革就成为了一句空话，深化教育领域改革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既定目标。

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已经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充分认识这个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矛盾、改革逻辑和发展目标，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的思想基础。中国的教育也将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面向新的任务，形成新的思路，达到新的水平，获得新的成就，真正成为人民满意的教育。（谢维和，作者系清华大学副校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5月16日6版）



黄达人：准确理解本科应用转型的内涵

今年2月26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提到“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随着政策落地和推进，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也引起了舆论热议。

从中山大学校长卸任后，黄达人教授就一直关注职业教育发展，并被邀请至各论坛、会议进行交流，讲述他眼中的职业教育和本科高校转型。本文是根据黄达人教授在各个场合下的发言综合而成。

我眼中的职业教育

卸任中山大学校长以后，2011年下半年，我走访了国内十五个省市的二十几所高等职业教育示范（骨干）校、民办学校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出版了一本访谈录《高职的前程》。可能很多人会奇怪，作为一个长期在“985”大学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怎么突然对职业教育感起了兴趣？一个现实的原因是，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可以更直接地为产业结构调整服务，提供大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高技能、高技术、应用型一线人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职业教育的深入理解，我认为，职业教育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高职的前程》前言里，我总结了职业教育的三个特征：一是师资，强调“双师型”的师资队伍；二是就业，强调持证上岗；三是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基础与实践结合。我发现，不仅在高职院校，在普通高校包括“985”大学里，也大量存在有着职业教育特征的专业。例如，临床医学专业的老师需要有在医院临床工作的经历。学校要办医学教育就要有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学生上岗前需要通过执业医师考试。所以，讲职业教育，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高职院校。由于教育管理部门机构设置等原因，造成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看法，把高等职业教育看成是专科层次的教育，把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的高等院校看成职业学校。这是对职业教育的一种误解。

正因如此，我觉得没有必要非得把应用技术型高校直接等同于职业教育的本科层次。应用技术型高校主要进行职业教育，但并不仅限于职业教育。而且，对于“职业教育”，大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现阶段，关键是把“应用型”这条路走起来；同样，也不代表其他高校就没有进行职业教育了。我赞成国家通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衔接中高职，打通职业教育断头路，提高职业教育办学层次，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做法。说明高等职业教育不仅仅是专科层次的，也不是只有命名为职业教育的学校才来关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现代职教体系很重要。打破了把高等职业教育看作专科层次的观念，回归了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说明职业教育是贯穿整个高等教育的一个方向。

因此，我建议，不要把职业教育体系和整个教育体系分得太开，尤其是在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不刻意强调把应用技术型高校纳入到职业教育体系，而是应该把高等职业教育放在高等教育的框架下去考虑。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老百姓很看重学历；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地位还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把职业教育独立于整个教育之外，反而可能无法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相互融合才能使得职业教育有地位。



普职融合的他山之石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可以也应该融合。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和新加坡的做法可以提供一些启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李建忠教授在《职教提高层次，国外怎么做？》文章里介绍，日本在建立职业教育体系方面，沿学历体系多重路径向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学制灵活，设立多种学习路径。高等职业学校的入学要求是初中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可插班编入高职四年级，同样，高职三年级学生可参加四年制普通大学或两年制短期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可在毕业后经过考试转学升入大学本科三年级，如技术科学大学或国立大学工科学院。二是为学生打通升学通道，职业教育层次不断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高职毕业生可获得“准学士”学位，升入同年在各校开设的相当于本科层次的“专科”继续学习，专科毕业后可获得与四年制大学相同的“学士”学位，拥有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教育资格。新加坡的情况也是如此。

即使是在职业教育高度发达的德国，提早分流是德国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前提也是各类教育形式之间进行互通，以便未来学生可以随时分流。

因此，要加深对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认识，我认为有三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把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放在完善中国教育体系的背景下提出，充分考虑与整个教育体系的融合；二是学校层面。对于学校而言，要有自己的办学定位，立足定位，办出特色，服务社会；三是学生层面。让学生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有着充分自由选择的权利，不是通过一次分流就决定了未来的方向，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可以有多次选择的机会。

所有大学都应关注“应用型”

关于本科应用型转型这件事，我是很赞成的。我认为，关于“应用型”，不应该在定义上做文章、去纠结，而是应该看到其本质。“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我们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让我们的学校更好地具备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能力，落脚点是办社会满意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要所有大学都来走“应用型”道路，但起码所有大学都应该来关注。

以中山大学为例。中山大学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国际水平，国家需求”。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由国务院发布实施以后，广东需求就是国家需求。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把广东需求作为学科、专业布局的依据，例如，农业学科、海洋学科等。在研究上，也非常关注应用研究。例如，医科，明确提出以疾病为导向；文科，我们主张问题导向。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特别注重给应用研究特长的教师以职称晋升的特殊通道。在国际合作方面，结合广东核电、电子等支柱性产业需求，先后成立了中法核工程学院以及中山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联合工程学院。

其实，所有大学都在关注应用的问题。例如，教育部、财政部正在实施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对其协同创新中心认定的总体思路为，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制度先进、贡献突出”的根本要求，依据国家、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规划以及行业、企业的重大需求，对协同创新方向选择的重大意义、深远影响以及紧迫程度进行认定。

“2011计划”有四类协同创新模式，这次候选认定的69个中心，有29个属于面向行业、产业类。我参加了其中一个活动注意到，此类中心特别强调以“支撑传统、引领新兴、产学研融合、贡献重大”为建设宗旨，经过改革发展，建设成为我国行业产业前瞻与共性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



推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转化平台，高端行业产业人才的培养摇篮。这次也看到，这类中心的牵头高校主要是“985”、“211”大学。因此，我认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并不仅仅存在于狭义的职业教育，也不为应用技术型高校所专属。“应用型”代表着一个办学方向。

之所以要强调这是一个方向，就是希望学校领导不要纠结于概念，而是要认清本质。大多数高校领导对于“应用型”是没有分歧的，就没有必要去争论是不是职业教育，也没有必要去分辨应用技术型与应用科技型在字面上的差别。推动本科应用型转型，关键在于如何去推动。用安徽省教育厅程艺厅长的话说，“用应用的方式推进应用型转型”。我也认为，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成为社会特别关注的焦点，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重要的是行动，而不要让一些概念上的争论扰乱了我们的办学方向。

新建本科向应用型转型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新建本科的问题。首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一直把“应用型”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合格评估中对学校办学定位的基本要求。所以，强调新建本科向应用型转型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与老的本科院校相比，明确办学定位问题对新建本科院校是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任务，这直接影响新专业的开设和布局以及教师队伍的建设等办学的重大问题。

第三，很多新建本科就是从高职、高专升格而来，对于职业教育的特征，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规律，比较熟悉。因此，在应用型转型或者坚持走“应用型”道路上比较有利。所以，我认为，新建本科院校是应用型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在前面已经提出，应用型的方向是所有高等学校都要关注的，应用型转型也不应只限于或专指新建本科院校。

我在一些场合也听到人们的一些评论，认为新建本科是因为办学水平低才会被划为应用技术类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应用不代表低水平；面向职场培养人才也不是低水平；强调应用研究更不是低水平。我特别认同清华大学谢维和副校长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概意思是，大学在培养人才、科学的研究和服务社会上可能定位各不相同，但不应以定位来判断大学的水平。大学的办学水平不是体现在办学定位上而是体现服务于定位的水平上。

本科应用型转型既要体现国家意志，也要注意多样化发展

我听说，有舆论认为，所谓推进本科应用型转型的《驻马店共识》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是用行政的方式改变学校的办学方式。要评价这个观点，我认为，应从国家意志和大学自主权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第一，关于国家意志，我想通过建设《大学章程》这件事来说明。从法理上来说，制定组织章程的是其投资者、发起人或举办者，对公立大学而言就是政府。也就是说，大学章程一定要能够体现举办者的布局和意愿，而大学在确定的框架下行使办学自主权。如果不能体现举办者的意愿，无法界定大学与政府的边界，《大学章程》的作用就无法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对于公立大学而言，政府作为举办者，如果国家意志无法得到体现，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也就无从谈起。

就我走访的情况来看，很多学校比较早地就明确提出要走“应用型”的道路，而且不少已经付诸行动。安徽、河南、山东、重庆等省市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出台政策或给予资金支持，鼓励转型。在此基础上，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时进行了总结、推广和部署，并指导成立了技术



应用大学联盟。我认为，这正是国家意志的正确体现。

第二，在保证国家意志的前提下，需要梳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大学不要有太多规定，让大学自己去发展。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马里兰大学前校长牟德博士在与我交流时提到，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思维模式是“不加控制，自由发展”。我也曾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大学要多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少一些指令性的文件。

最近对于落实大学自主权的讨论比较多，我认为，落实大学自主权，不在于要给大学多少权力，而是应该明晰政府和大学的权力边界。借鉴最近比较热门的负面清单的概念，所谓负面清单，就是政府在管理过程中以“非禁即入”为原则，仅规定禁止或限制进入的领域。那么，在讨论大学自主权方面，是否也可以转变一下思路，从规定“大学可以做什么”到明确“大学不能做什么”。政府不再给大学画圈，而是政府先把权力的边界划好，把办学的空间留给大学。

另一方面，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要加强考核和评估。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简政放权是手段，根本目的是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大学，从管制型向监管型转变，这里面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该放的权力放掉；二是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因此，政府在转变职能的背景下，对于大学的管理应该侧重在监督。

例如，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有了重要转变。本科教学评估已从水平评估改为审核评估以及针对新办本科院校的合格评估。合格评估抓底线。而所谓审核评估，是按学校自己确定办学目标进行评估。

我认为，审核评估代表了政府对大学管理的一种导向，即对大学的评估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是用同样一套指标体系去评价大学，也不是用定量的方式去考核大学，而是看大学是否遵循自己的办学定位，是否实现了办学目标。

第三，作为学校而言，在走“应用型”道路时，不要照搬其他学校的经验，努力办出特色。

去年年底，我请陈至立同志为海外大学校长访谈录作序，她说她最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注重大学发展的多样性。香港城市大学程星副校长则套用了一句名言：平庸的大学都是一样的，而优秀的大学则各有各的优秀。

我想，大学发展要多样性，本科应用型转型同样也要注重多样性。在现实中，我看到了各种精彩案例。有的立足地方，强调错位发展。例如，黄淮学院、徐州工程学院；有的原来是行业办学，现在要回归行业，强化行业。例如，武汉纺织大学、重庆科技学院、南京工程学院；有的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也积极对接行业和区域支柱产业。例如，常熟理工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有的是中德合作，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课程改革思路。例如，合肥学院；有的建设与城市密切互动的城市型大学。例如，成都大学。等等。

另外，各个学校探索应用型转型的规模和范围也各不相同。多数学校整体转型，也有的学校在几个学院甚至在几个专业先探索应用型转型之路。例如，曲阜师范大学。

总之，特色发展必然呈现多样性。在转型发展时既要贯彻国家意志，也要充分尊重大学的自主权，不能“一刀切”。

走“应用型”道路要关注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

我认为，对于大学而言，不管走不走“应用型”道路，都要关注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包括



大学的办学定位、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师队伍等。对于走应用型转型的高校，就是需要在高等教育的这些基本问题上，突出应用的特征。例如，人才培养的定位是要培养技术型人才，强调回归职场。我很赞成北京交通大学查建中教授对于应用型的理解，他认为，这是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我觉得，是否也可以说，应用型强调面向一线、面向现场培养人才。又如，研究工作的定位强调面向行业、面向产业的应用研究，以产学研结合为特征。重点关注管理规范创新、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等等。

这里，我特别想讲一讲学科基础建设的问题。在本科应用型转型中，需要重视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对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强调学生对职场的适应性，而不要求在专业教育中学科知识的完备性和系统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学生的专业教育上，淡化学科体系不等于只关注学生的专业发展。在学生培养上，体与用、道与术的平衡是永恒的话题。我也看到一些明确走“应用型”道路的学校非常注重大学文化的建设，注重塑造学生良好的精神和气质。

同时，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教师，他们是学科的专家。学科水平高低是评价教师的重要依据。我想，专业是培养学生的组织形式，而学科则是教师的成长道路。

对于新建本科而言，更加不能忽视学科建设。一方面强调要向应用型转型；另一方面要注意从专科到本科的转型。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提问，专科和本科的区别在哪里？得到了很多回答，也受到很多启发。最近，为了找到更为根本的区别，我认真阅读了《高等教育法》，找到了一些依据，列举出来：第十六条，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下列学业标准：（一）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二）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第二十五条，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第四十七条，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教授、副教授除应当具备以上基本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论文或者著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学科是本科区别专科的重要特征。

走“应用型”道路，强调围绕行业、产业建设专业群，但是要注意到，支撑专业群的是学科群。我认为，“应用型”既体现在培养的学生为职场所欢迎，又体现在学校有能力为社会和企业服务，而服务能力的基础就是学科的水平。（本报记者梁国胜整理）（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06月16日11版）



大学招生：看世界银行如何“把脉”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全球大学招生模式》提出，公平的招生制度应当公平地对待所有考生，应当有明确的标准可循，但也应该考虑考生无法控制的情况。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落下帷幕，高校招生的号角也随之吹响。大学招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然而这个难题却始终困扰并考验着世界各国政府。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全球大学招生模式》对当前世界上各种招生录取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此，本报对报告进行解读，以期为国内大学招生提供经验借鉴。——编者

■ 孟庆涛 何美 武向荣（编译）

“学生被甄选进入高等教育的过程称为高校录取或入学选拔，不同国家的具体做法有很大的差异。”世界银行最新报告——《全球大学招生模式》开篇指出，通常情况下，学生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向学院或大学提交录取申请。在有些国家，政府机构或独立的组织负责管理大学入学考试以及学生入学地点的分配。某些院校和专业的名额既可以由政府统一管理，也可以由院校自己分配。

没有“正确”的招生制度

目前，有些国家的大学招生录取程序相对客观，仅看入学考试成绩。有些程序则相对主观，会考虑未来学生的考试成绩档案、学业表现、推荐信以及课外实践活动等。有些国家采用多元录取制度，有时这种制度在公立和私立院校之间还有差异。所有这些变量带来的结果，必然是高等教育录取工作的参差不齐，同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审视世界各国大学目前的招生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正确”的招生制度。招生制度的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这一制度的具体环境，包括政府结构、经济因素、劳动力市场、文化和国家的优先政策等。

政府和高校在设计、评价或改革招生制度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在既定情况下，要确定哪个制度最有效，需要考虑以下问题：在宏观层面，这些问题涉及对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控制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在招生过程中，这些问题涉及考虑不同因素的信度和效度，包括预测学生成败的能力。所有这些问题最后都落脚到公平性和公正性，同时要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如资源匮乏，缺乏足够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体系等。

必须从不同角度实现公平

“录取过程的公平问题看似非常简单。合理的录取过程可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所有申请人都必须符合同样的标准，条件最好的考生被录取到最好的专业。”《全球大学招生模式》表示，根据这一定义，公平与客观似乎有很强的相关性。基于考试成绩的招生制度几乎没有给主观解读或偏好留出任何空间，因此似乎是最公平的。

然而，《全球大学招生模式》强调，录取公平问题十分复杂，必须考虑录取过程不同的节点，以及某个国家或地区更大的社会经济环境。事实上，为解决多面复杂的公平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招生制度都把人口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许多基于考试的招生制度为特定的群体设置了差异化的最低录取分数，如少数民族学生、残疾学生和经济困难学生。在较少依赖考试的招生制度中，也以不同的形式考虑了人口因素，并且赋予它不同的权重。美国的“平权行动”计划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批评者断言，“平权行动”计划歧视非少数民族学生，以牺牲更加合格的同龄人为代价录取了素质较低的考生。该计划已经引起了许多诉讼，包括在美国最高法院层面。而且，包括密歇根州、



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在内的一些州政府已经为“平权行动”计划在公立院校的实施提出了具体的限制条件。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并不限于美国，著名学者阿加瓦尔指出，印度围绕种姓制度的平权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并将继续是一个分裂化和情绪化的问题”。

在一片争议声中，人们提出了人口因素的各种替代方案，以确保大学录取过程公平。例如，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采用等级排名而不是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SAT）成绩作为衡量手段，就会录取更大比例的少数民族考生，并且不会显著影响整体毕业率。

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要想制定最好的招生制度，必须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公平问题。公平的招生制度应当公平地对待所有考生，应当有明确的标准可循，但也应该考虑考生无法控制的情况，以便取得更大意义的公平。在腐败猖獗、经常是个人影响力决定一切的环境中，一个相对客观的基于考试的招生制度可能是保证公平公正的最佳选择。特别是当最低录取分数还考虑了人口因素，那将进一步促进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分权的、不基于考试的招生制度，可以通过考虑人口变量以及其他各种录取因素促进公平。高等院校和招生体制应当明确说明具体考虑了哪些因素以及各个因素分别被赋予了多少权重。

《全球大学招生模式》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校招生过程的问题更加明显。报告建议，关键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数据收集和管理系统，利用这样的系统，在国家、地区和学校层面分析比较申请者数量、考试成绩、录取率、毕业率以及其他各种变量。通过这样的数据收集和定期分析，政府可以监测这些录取程序在实现经济、社会目标方面的有效性，确定何时做出调整或改变，并确定修改时应努力的方向。

招生制度改革应该渐进

招生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而不是彻底的革新。许多近期提出的改革措施来自录取过程严重依赖考试的国家。在有些国家，改革的重点要么是修订考试本身，要么是改革考试管理。另外一些国家的改革则是将其他因素纳入招生过程考虑的范围，例如学生的中学学习成绩。《全球大学招生模式》表明，自 2000 年以来，招生制度已发生明显改变的代表性国家如下：

沙特阿拉伯 在 2008 年之前，沙特中学生必须参加由沙特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统一毕业考试，这是大学录取的主要依据。然而由于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国家级考试，出于对学生考试焦虑的担忧，现在已经被取消了。代之而来的是各中学负责实施各自的毕业考试。教育部则为其提供有关考试的总体目标以及考题数量和类型的指导原则。虽然录取过程会考虑这些中学组织的毕业考试，但学生的高中平均成绩将占更大的权重。

英国 英国高校抱怨，在英国高中课程（A-Level）考试中获得最高等级成绩的学生太多，以至于它们很难确定哪些考生是最佳录取人选。为此，英国高中课程考试于 2008 年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等级，以便“挑战那些聪明的学生，帮助高校在他们中间做出区分”。2007 年，教育官员开始试验，考试成绩排在前 10% 的考生将获得新的等级。一位教育局长认为，“政府的这一举措姗姗来迟，但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近年来，考试等级的通胀已经悄悄渗透到英国高中课程考试中”。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所最近通过了一项决议，描述了国家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管理的新程序。该决议希望通过使用标准化程序确保考试管理的公平。决议主题包括考点、注册程序、对考生的身份验证、学生考试期间的行为规范及对不当行为的制裁措施。

当前，已经提出招生制度改革措施或者正在实施过程中的代表性国家如下：



伊朗 伊朗的高校招生完全基于学生在名为“konkur”的考试中的表现。由于对受教育机会和教育公平问题的担忧，有人认为“伊朗学校已经变成了为考试临时抱佛脚的工厂”，有人批评考试过程是“在考试失败的年轻人中制造心理和社会问题，如焦虑、无聊和绝望”。因此，伊朗政府正在考虑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尤其是考虑将考生在中学阶段最后三年的累积平均成绩用于招生录取。还有人建议将社区学院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以便“将低学术倾向的学生分流，不再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从而减少考生的整体数量，防止不太合格的考生因考试失败而产生焦虑”。

保加利亚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保加利亚政府最终在2009年引进全国中学毕业考试。学生的考试成绩被视为高考录取的主要依据。各高校不再组织自己的招生考试，从而减轻了学生的负担。在这之前，学生要分别参加自己申请的各个大学的考试。

韩国 2009年，韩国大学通过和理科高中之间签署的招生协议破格录取学生，其中包括“天才”理科高中。这类高中的数量及所招学生的数量也在之后几年有所增加。这项新政策促使韩国大学和各高中签署协议，确定录取学生的数量。选拔新生从而依据研究计划、考试成绩以及申请人在高中阶段所做的研究。(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链接

全球大学招生模式分类

类型一：中学毕业考试

仅国家级考试成绩（奥地利、法国、爱尔兰、埃及）

国家级考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坦桑尼亚）

国家级考试成绩+申请材料（英国）

地区/州级考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澳大利亚）

类型二：大学入学考试

仅国家级考试成绩（中国、伊朗、格鲁吉亚）

国家级考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土耳其、西班牙）

仅大学入学考试成绩（阿根廷、巴拉圭）

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

类型三：标准化能力倾向测试

标准化能力倾向考试成绩或中学学业成绩（瑞典）

标准化能力倾向考试成绩+申请材料（美国）

类型四：多种考试

国家级招生考试成绩+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日本、俄罗斯、法国）

国家级招生考试成绩+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或）中学学业成绩（巴西）

国家级中学毕业考试成绩+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芬兰）

国家级中学毕业考试成绩+标准化能力倾向测试成绩（以色列）

不同机构组织的多种考试（印度）

类型五：不考试

中学学业成绩（挪威、加拿大）

只需申请资料，不需考试成绩（美国部分高校）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16日21版）



高教视点

高校改革：好政策要执行到位

编者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正在逐渐清晰，步伐也明显加快，从两、三年前相继推出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大学章程制定、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政策，到今年年初以来大学学术委员会规程、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综合改革试点以及研究生质量体系保障政策的推出，再到教育部最近放出口风说要进行高考模式的分类改革，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已迎来了一个政策的快速供给期。本文作者认为，高校改革的政策利好已经形成，但并不意味着高校改革就一定有成效，针对过去高校在改革中出现的碎片化、表象化现象，把好好的政策消解于无形，当前高校改革面临的难题仍是怎么把好政策执行到位。

碎片化、表象化的实质是“无改革”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高校改革的一些“试点”、“意见”、“治理”等隐含着将给高校更多、更大自主权的政策话语，越来越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一阵密集的政策供给之后，政府将会很快把改革的“接力棒”交到高校手中。这也就是说，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将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改革走向高校层面的中观改革，从高校的外部治理走向高校的内部治理。

但是，让人难免担心的是，高校也许会在这一过程中只是汲取政府释放的“政策红利”，而对触动相关人群利益的改革则采取太极推手式来回避或消解。结合过去的经验，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近年来，高校都在异口同声地强调改革，也没有哪一所高校说它没有在改革，但事实上仍是一种“无改革”。所谓“无改革”，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是指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不是说高校的领导者不想改革，而是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执行得很差，从而导致“无改革”局面。

事实上，我国的高校并不缺少改革的话语，谁都在谈论高校内部改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缺乏改革的动力，因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就足以构成改革的动力。之所以会导致“无改革”局面，就是因为缺乏能把改革话语、动力转化为改革行动、富有成效的顶层制度设计以及相应的操作思路和执行能力，要么演化成“今天一个规定、明天一项措施”式的“碎片化”改革，要么沦为某些领导者个人推动、某些部门单独热衷的“从高调开场、以失望收场”式的表象改革。如近年来一些高校为革除行政管理效率低下、学术行政化的弊端所推行的职员制改革，不仅步履艰难，而且最后只是在满是抱怨和不满中部分地解决了低阶行政管理人员的身份问题。以上这种所谓的改革，大多只是技术层面的细化或局部调整，越来越难有以往的那种成效，也难以解决那些早已累积而成且各种问题盘根错节地搅缠在一起的结构性难题。

高校要突破过去那种“无改革”，碎片化、表象化的局面，就需要高校的领导者有果敢的勇气和意志，敢于打一场高校内部治理改革的攻坚战。要紧紧围绕目前格局下出现的高校改革难题，

以当前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制定大学章程为契机，把顶层制度设计以及相应的操作思路和执行能力的优化和提升统一起来，寻找能为解决问题提供建设性制度力量的“抓手”。

三方面分权，让责权界限不再模糊

以治理主体多元化为主要标志的高校治理改革很有可能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使各主体的责权界限更加趋于模糊，因此当前高校改革最关键的是要分权，而且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权，从而让责权界限不再模糊。

一是把高校施政权中的校党委系统与校行政系统在体制上区分开来，明确其各自的权责范围。因为在实践中本来处在大学内部系统中最高地位的校党委要么被架空（或被无视）而难有大的作为，要么为了寻找出路而跨越其权力边界，进入行政或学术领域，从而加重了高校的“行政化”。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大学校长也往往就此在高校管理责任方面存在推诿现象，如把自身工作的低效说成是校党委对其权力的越位。

二是把校行政系统与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系统区分开来。评上教授后虽然可以做官，做官后也可以评教授，但一定要在体制上逐步消除所谓的“双肩挑”现象，坚决防止行政权力和学术地位之间的“通兑”现象。之前媒体曾报道湖南大学等高校的新任校长许诺任职期间不带研究生、不申请科研项目的做法虽令人感到鼓舞，但毕竟还只是个人作为，应该将这一做法扩大化，制度化。

三是在学术系统中把学生的学习权突出出来、独立出来，使学生成为高校多元治理框架中平等的一方。所谓学习权，就是指学生基于满足自身基本学习需求这一目标，而通过对学校的招生、教学、课程设置、教师评价、教师聘任、学生生活等事务发表意见和施加影响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权利。实践已多次证明，教授们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代表不了学生的权利，指望他们在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场合中维护学生的利益，是不科学的。

有效参与，杜绝权力运行中的“摆设”

所谓“有效参与”，就是在高校治理中扩大并容纳有序参与，各有关方都能无阻碍、有效地参与到高校治理的进程中来，都能发表实质性且有影响力的意见，即高校的每一成员都能参与或都有代理人参与到会影响其自身利益的、以公共决策为主要内容的权力运行过程。如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不能仅仅作为一种“荣誉头衔”，而必须拥有发挥其维护和促进学术健康发展、维护教师基本权益的实质权力，要真正起到其在制度中规定的作用，千万要防止其成为一些学校规章制度“被合法化”和“被合理化”过程中的“摆设”。

为此，一是要通过宣传乃至培训，增强有关各方尤其是处在传统弱势的一方参与高校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目前的重点就是唤起教授对学校事务的热情，激发学生对自身学习权益的重视，其权力诉求，不再仅仅以保护个人私有利益为前提，而应着眼于维护整个群体的权益。

二是要给他们多方创造便于参与的通道和方式。如当前本科教学之所以总是容易受到忽视，



不仅仅是因为大学生常被视为学校“来去匆匆的观光客”，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教学改革等这些涉及及其自身利益的政策的通道和方式非常少，即便其拥有的类似学生评教制度这一单一的方式也很不完善，这难免会使学校对学生提供的教学服务经常被打折、缩水。而理想的状态应是，大学生除了可通过校理事会中的学生代表直接参与大学事务之外，还可凭借新闻媒体、家长组织、中介组织、雇主协会等方式来表达其权利诉求。

三是建立权力能得以有效行使的配套组织机构。如学术权力之所以在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框架下难以得到彰显，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校长是否退出学术委员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缺少相应的下属咨询机构和支持机构，从而导致学术委员会的很多职责不得不由行政机构来行使。

内外监督，促使高校改革注重办学绩效

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任一群体及其成员的行动都能得到有约束力的监督。一方面，在校内，由于高校是一个整体性的工作，高校的“分权”绝不是自弹自唱、各霸一方的诸侯思维，而是各相关方要通过相互监督，形成一种既相互制衡又互为“利益攸关方”的关系。与此同时，还要想办法降低监督一方在道德、组织以及物质上的负担，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和退出。如通过校园网开辟类似“校情评论”的专栏，并建立舆情收集、分析及反馈机制，这样，大学生等群体就可持不同动机而无须背上思想包袱或道德压力，对有关机构及人员展开广泛的监督，并能提高其参与学校治理的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校的办学质量等事项已不再是其内部的“私事”，而必须本着为社会负责的精神勇于随时亮出“家底”，以接受社会大众、社会媒体等这些“看不见的眼睛”的关注、审视及其道德的、制度的乃至法律的评价和考问，让他们不再是仅仅听高校如何说，而是能看到高校如何做，如何使自己满意，由此形成一种自外而内的压力和期望，从而促使高校向更加注重办学绩效的方向渐变。与此同时，只有敞开式地接受外界的监督，也才能争取到社会最大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有关改革也才能顺利而持久。

当然，由于“刀总是难以削自己的刀把”，这就需要政府在现阶段还要继续发挥自身所拥有的主导功能，并从当前的“给予空间和放权”过渡到“为强化高校内部改革的预见性和持续性创造制度性条件”，如花费时间和金钱在相关群体中间进行有关高校治理改革的、开放式的组织宣传和动员，连续性地向外界公布诸如办学绩效等相关数据，培育相关社会组织以使其成为高校“共治”结构所能借力的重要主体，等等。如此这样，才能触动高校领导者的灵魂，使他们有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意愿和决心，也才能顺藤摸瓜，为高校近些年来累积起来的诸多结构性难题提供解决的倒逼机制和自我强化动力，从而向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目标迈出坚实的一步。（罗志敏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5月13日）



“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实与质

2010年，我国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高等教育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强调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

一直以来“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这一理念被人们广为接受，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不断改革、创新，以提升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可是来自大学生、社会用人单位等方面的信息仍然显示：大学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社会需要。如果能从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实际现状和本质、大学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的规律两方面进行研究，对促进社会和大学深入认识“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这一理念的实质，在尊重各自系统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大学和社会的沟通，从而对推进大学和社会之间协调发展将大有裨益。

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之实

从大学人才培养实践来看，人才培养大致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等主要内容或环节。通过这些具体环节，我们可以考察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之实—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现实状况。

（一）从人才培养目标看

社会需要具有多层次、多类型的特点。据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调查，“不同类型、不同科技含量的企事业单位对人才需求有不同的要求与侧重：科研院所以引进研究型人才为主，一般的企业尤其是国内的中小企业则侧重于引进应用型和管理类人才；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有着迫切的需求，希望其员工的知识结构能够多样化和综合化；另外，理想人才要具有三方面的较好素质，即‘有敬业精神’‘实际工作经验’和‘受教育程度高’”。

我国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社会需要，但人才培养规格单一、类型区分度不高、同质化现象还普遍存在。普通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及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没有明显区别。虽然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大学有加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趋势，但在实践过程中，大学偏重理论型人才培养的现象仍然存在。人才培养目标的类型区分度不高、目标同质化现象严重直接导致大学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社会对人才日益多样化的需要。

（二）从人才培养具体实施过程看

1. 专业设置缺乏目的性和针对性

大学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专业目录指导下设置专业时，对这些专业在人才数量和层次等方面的社会需求进行的分析和预测往往存在偏差，从而造成人才培养的盲目性。麦克斯发布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0年本科生就业中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等，而这些专业恰恰是当年招生时的热门专业。造成失业量大、就业率低的原因在于供大于求和人才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要求，一方面应届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岗位，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

2. 课程内容重“鱼”轻“渔”



从学生角度看，有调查表明，在教师专业能力、教师敬业度、课程考核方式、学生学习兴趣、课程内容和实践实习等七项指标中，有 46% 的 2011 届本科毕业生认为专业教学中“实习实践环节不够”，19% 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不实或陈旧”，还有 17% 的学生认为专业教学无法调动学生兴趣”。这三个问题是学生认为“专业教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用人单位看，用人单位更看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知识拓展能力。据肖云等研究者对重庆大学生和用人单位的调查显示，“63.2% 的用人单位表示看重大学生的实践经验，只有 5.5% 表示不看重。50% 的用人单位最看重大学生的知识广博度，其次看重的是专业知识，占 43.5%”。这表明“用人单位偏好‘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人才培养实践中注重通过大学课程结构和具体教学内容向学生呈现更多系统知识、忽视通过实践教学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成能力、忽视学生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培养的做法造成了无法化解的难题。一方面，对一些新兴专业和学科，由于其知识体系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还不成熟，学生只能学到一些“皮毛”；另一方面，当下我们正处在知识社会中，更快的知识更新速度导致即使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内容，学生仍然觉得教学内容陈旧，更勿需说有些专业和教师几十年不变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因此，无论“太新”“太旧”的知识或重知识、轻能力和方法都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在我们的人才培养计划中，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完善学生在校期间的培养，而忽略了对学生终身学习和培养的规划。这也间接导致了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中，学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

（三）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看

1. 社会用人单位缺位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过程

实践中，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实质是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但用人单位在人才培养评价标准制定的初始环节就被排除在外。在我国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过程中，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社会用人单位既没有作为主体参与到目标制定的过程中来，大学也没有有效机制保障其需要在培养目标中能够有效体现。由于大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用人单位并不能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对其质量进行过程性评价，只能在毕业生上岗后，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终结性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很多是随机的、被动的、非系统的，也难以有效地反映到大学的人才培养中去。这使大学人才培养丧失了一个把握社会需要发展趋势的途径，增加了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难度。

2. 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缺少外部社会评估机构

我国大学评价是以政府的利益目标为依归的政府主导性评价，主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来承担，社会中介评价占很小的比例。少数社会评估机构也多有教育行业背景。真正完全由教育系统或大学之外的社会系统建立并代表、反应其利益诉求的评估机构几乎没有。而且，在上述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多以毕业生就业的数量指标来反映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教育系统主导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机构难以从社会其他系统需要的角度审视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因此，现有评估机构和评估指标体系无法充分满足大学与社会之间通过评估实现导向、参谋、沟通、交流的目的。

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之质



(一) 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是具有不同价值追求和发展规律的社会系统之间既“相斥”又“相吸”的活动过程

1. 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规律

大学人才培养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活动。因此，追求学术自由、“传道、授业、解惑”、探索新知是大学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大学人才培养还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等规律。但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代表的其他社会系统则以经济效益、文化发展、社会和谐等为根本诉求。社会需要往往具有多个层面，既有“急需”一可能体现为短期需要，也有长期需要、潜在需要和战略需要；不同需要主体的需要也存在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大学人才培养之所以难以完全适应社会需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目标不仅仅是为社会服务，而且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和系统的价值追求及发展规律。

2. 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之间是不同社会系统间既“相斥”又“相吸”的活动过程

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规律，但同时又处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大学通常与他们所属的社会具有正反并存的关系—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既具有服务性，也具有批判性；既需要社会支持，也是社会所需要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既“相斥”又“相吸”的关系。

二者具有相斥趋势的原因是：大学是“求真”之地，无论是科研—求“真知”，还是教学—育“真人”，“求真”的价值追求和实践要求人才培养尊重科研和教学的规律，保证学术自由和教学、科研的独立性；而社会需要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型，它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总是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从这个层面来说，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之间是“相斥”的。二者“相吸”的原因是：大学人才培养活动与社会需要之间围绕人才这个核心内容相互作用。大学人才培养的对象是学生，目标是通过培养活动帮助学生增长知识、形成能力，成为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人才。社会其他系统根据自身需要，要求大学为其提供能适应并促进其发展的、专业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大学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正是围绕人才这个核心因素在“相吸”又“相斥”的互动过程中发现双方新的生长点，促进两者不断发展的。

(二) 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具有相互调适与引领的性质

根据《辞海》第六版的释义，“适应”是指个体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调节自身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环境的互动过程。从这个释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适应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适”，即个体随环境的变化改变和调节自身；另一方面是“应”，即个体对环境并不是消极的改变自身，而是在调节自身的同时还要对环境施以反作用。因此，大学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也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大学人才培养既有根据社会需要调节自身“适”的方面，也有根据自身规律“应”的领域。这个“应”就是引领。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之间是相互调适、互相引领的辩证关系。

1. 大学发展的历史体现了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之间相互调适与引领的性质

从大学发展的历史看，某种程度上说，大学今天所呈现的状态是大学与社会需要相互调适、互相引领的结果。中世纪大学的两种主要模式即以学生为中心的意大利大学和以教师控制学生为主的巴黎大学，最终因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更符合行会组织的发展要求，适应现实社会和个人的



需要而得以存在并迅速发展。大学职能从最初只具有教学职能直至目前具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的发展变化历程，也是大学人才培养与适应社会需要相互调适、互相引领的结果。历史说明，高等教育只有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生存和发展。

2. 大学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之间是有限的调适与引领

大学人才培养是在遵循大学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引领社会需要。如果抛弃了自身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规律而一味地去适应社会需要，有朝一日大学将不再成其为大学。德里克·博克认为：大学应该避免承担其它类型组织能够做得同样好的任务。大学的资源在于图书馆、实验室、享受很大独立性和具有不同知识兴趣的教师，大学应该从事利用这种资源的活动。大学人才培养活动的性质、价值追求和发展规律决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相互调适与引领的有限性。大学人才培养是以教学和科研成果批判地适应社会需要。另外，社会需要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型，大学与社会需要有关联的任务太多，维持高质量的大学人才培养变得日益困难。因此，大学只有通过自身类型的多样化及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才能在有限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引领和促进社会需要。

当然，只有在社会需要与大学人才培养之间建立尊重二者规律的、适合各自特点的机制才能保障其相互调适与引领。许多大学已经开始探索建立人才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机制，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各大学还需要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路。（作者肖念、李可，单位：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来源：《北京教育》2014年04月24日）

高校要主动提高驾驭市场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说明时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现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已经从以往的“基础性作用”转变为今天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对于首都高校全面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校要深刻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变化

市场对资源配置从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变化，是市场逻辑展开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必然结果，是党的十八大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突破。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高等教育的运行离不开资源及其优化配置。因此，高校要联系当前高等教育的实际，清醒、敏锐和深刻地认识市场作用的变化。

高校与政府、市场的关系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



时期内，高校由政府集中统一管理，没有自主权。随着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及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以及几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探索实践，高校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逐步向适应社会需要的方向转变，市场在高校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

未来在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市场必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则将更加注重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治理。首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 2003 年就达到了 52%，标志着首都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2 年，北京市共有普通高校 91 所，教职工总数达 13.73 万人，普通在校生总数达 81.87 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 60% 以上。首都高等教育的主客观条件、环境都显示了日益明显的普及化特征。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愿望更加强烈，需求更加多元。首都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意味着办学条件需要不断改善，经费投入需要不断增加，这是满足首都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高等教育需求的硬件要求。根据预测，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2020 年将达到 40%，届时，中国半数以上省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超过 50%。未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及其优化问题更多要靠市场去解决，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效治理能力相应地需要不断提高。对此，高校要深刻认识和积极应对。能否把握市场，抢抓机遇，就成为高校驾驭市场能力的关键所在。

高校要勇敢地进入市场

当前，市场介入高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市场给高校之间带来的激烈竞争，更是不争的事实，大家都在争取更多教育经费、科研基金、优质生源和高水平师资，而且这种竞争越来越市场化，不再是行政化。高校不是企业，但要按照市场的逻辑提高办学质量，按照市场的要求调整招生计划，按照市场的变化趋向调整学科专业，按照市场的需求导向安排课程门类和开展科研活动等。

我国有学者将影响高校办学行为的市场分成了几类：一是高等教育服务市场，高校是提供服务的一方，学生和家长是接受服务的一方；二是科技知识市场，高校是科技知识的出售者，企业和政府是购买者；三是劳动力市场，高校是劳动力的提供者，用人单位是劳动力的需求者；四是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高校是资金和资本的需求者，政府、个人、组织或企业等是资金和资本的提供者。高校既然已经离不开市场，那么就要勇敢地进入市场，利用好市场，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高等教育。

高校进入市场，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高等教育，并不是说离开政府“单干”，而是仍要服从政府的管理，按照政策导向来发展。新形势下，政府对高校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越来越注重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治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科学布局、制定相应的竞争规则等。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

高校要善于驾驭市场

高校进入市场，必然要求学校领导者善于驾驭市场，利用市场规律和规则提高办学质量。



首先，高校是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科学定位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应不同层次需求之别，只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针对市场不同的需求人群，划分为不同类型。各类型的高校都有针对不同社会需求的精品，都有满足不同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成果。也就是说，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是通过细分社会和市场的需要而进行定位和运行的。只有细分市场，才能更好地驾驭市场，才能培养出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才能研发出满足社会需要的高质量成果。北京联合大学定位重点放在“应用”上，提出“学术立校、人才强校、开放兴校”，意在通过对既有领先技术的优化集成、交叉融合，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改善生活质量的需要。学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应用”类型上办出高水平、高质量，提供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北京联合大学可谓是“一大、五多”：学校大，办学校区多、层次多、学生多、教师多、学科专业多。学校在多校区的情况下，通过讲全局、讲布局、讲功能、讲发展；在办学层次多的情况下，通过讲本科主体、讲人才培养质量、讲实力；在学生多的情况下，通过讲因材施教、讲个性化培养；在教师多的情况下，通过讲结构、讲层次、讲梯队；在学科专业多的情况下，通过讲学科群、讲优化、讲内部机制联系、讲优化资源；最终实现在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基础上的领先技术的优化集成、交叉融合，服务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其次，高校要研究和利用市场规律为我所用。市场是以利益作为取向的，高校要主动融入市场、服务社会，研究高等教育规律促进自身的改革和发展。高校最大的资源是智力资源，要融入市场，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战略，服务于首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发挥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参与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科技知识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资源的配置和竞争。例如，有效利用市场的竞争规则参与市场竞争，抓住并开拓生源市场、就业市场、科学市场、社会服务市场等；借鉴市场规则在内部办学机制方面进行创新，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投入产出绩效分析等；根据市场环境及需求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置等。

再次，要将把握市场取向与高校办学理念相统一。市场是以利益为取向的，而高校办学的理想和追求是培养人。培养人就是要关注人的发展，对人类先进文化和崇高精神发展怀有使命感，这又是以人为本的，而非功利的。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需要注意并处理好，既要进入市场，按市场的规则和规律办事，又要把握住办学的理想和追求。为此，高校要建立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要把资源配置、经费保障、人员流向和提高教学、科研和育人质量一致起来、统一起来。

未来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管”“办”“评”分离，来自市场的第三方评价必然会对学校的办学导向产生深远的影响。总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由发挥“基础性作用”走向发挥“决定性作用”，必将深刻地影响到高等教育领域，高校应清醒认识、主动融入，驾驭好市场规律，促进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推进首都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增强办学实力和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作者徐永利，系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来源：《北京教育》2014年04月04日）



制度正反“双向”确保大学良性发展

我们都知道，制度对一个单位的发展很重要。好的制度，既能激发人的正能量，也能约束人的负能量，应具有“双向度”。“双向度”制度，是针对职业激励制度而言的，其强调有“进”，也得有“出”；有“上”，也得有“下”。只有“进”和“上”的制度，就是“单向度”的制度，而“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制度，就是“双向度”的制度。

但是，纵观目前大学的一些制度，以“正向”激励的多，以“负向”约束的少；或者说，执行“正向”激励的多，执行“负向”约束的少。其实，职业激励制度“正向”的“进”和“上”，具有显性的激励作用，而作为“负向”的“出”和“下”，既是一种显性的约束，也是一种隐性的激励，虽为隐性的激励，但这种激励往往比显性的激励更为有效。它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潜能的关键所在，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确保制度本身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大学进入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大学而言，要以“双向”共同构成职业激励制度的完整体系，二者缺一不可。

我们看到，很多大学在制度制定的初期极富发展力，但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不但不发展了，甚至还倒退了；很多员工最初也很有工作的积极性，但一旦达到他们职业生涯的最高台阶，就满足现状，没有进取心了。究其原因，是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是制度在执行路径上出了问题。比如，在大学人们的职称、职务晋升，往往只强调“进”和“上”，而忽略了“出”和“下”。换句话说，就是只注重了选拔制，而忽略了淘汰制。无论是业务人员的职称，还是行政人员的职务，人们已习惯从低向高一步步地提升，很少听说某一个人，从高一级又回到了低一级，甚至取消某一职称或职务的任职资格。这种“终身化”的体制，使制度的“单向度”走向极致。而无数事实证明，任何“只进不出”“只上不下”的“单向度”政策，只能使竞争丧失其本源意义，进而造成大学发展的动力不足、活力不再。

可以说，大学遇到的发展问题，一般都与制度有关。近年来，国内无论是“985”高校、“211”高校，还是一般院校，为了解决发展的瓶颈，纷纷出台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敢啃“骨头”，敢蹚“死水”，敢破“坚冰”，从不同程度上打破“僵化”体制和固有的利益格局，很多措施就是直接针对当下“单向度”制度而设置。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在“改革完善分配制度”中，提出“体现发展和动态激励为基本原则”；在“干部考核和管理”中，提出“把对干部的考核和任期目标完成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氛围。南京理工大学对新入校人员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真正建立起“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北方交通大学注重考核环节，“将教师的基础教学考核与科研效果考核并重”，同时提出“4年聘期考核不合格者，在下一个聘期将降级、转岗或解聘”。天津大学从明年起，将拓宽博导选拔制的“进口”，疏通博导淘汰制的“出口”，打破博导资格“终身制”，让博导们“能上能下”。总的来看，这些改革措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出”，不仅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学校的办学



活力也有明显提升。以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为例，2013年，学院科研经费到账大幅增加，科研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升。2013年11月公布的ESI排名，该学院从全世界300多名前进至177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职业激励作为大学管理的核心，一方面是个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学校发展的需要，如果运用得好，就能有效促进“学校要发展”向“个人要发展”的转变。毫无疑问，这种转变是发展动力的转变，反过来会极大地促进学校的整体发展。因此，从学校层面来讲，在制定职业激励制度时，既要重点考虑一线教师的职业发展，也要兼顾机关各类人员的职业发展，应尽可能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合理的、有效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发展空间，并且每一政策的导向都要有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而不应在制定制度层面人为地限制他们的职业发展；或所出台的政策，不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而是挫伤人的积极性。因为，无论是限制一部分人的职业发展，还是挫伤一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学校的整体发展。

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可以对一部分人起到激励作用，也会对一部分人起抑制作用。但在大学发展中，当“个人发展”这一发展主体的积极性长期被抑制或弱化时，大学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于媚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6月10日）



他山之石

对话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校内改革并非简单放权

编者按：在教育综合改革的大系统中，高校是一个子系统。一方面，高校期待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简政放权，另一方面，高校自身也面临着简政放权，释放院系活力的改革任务。记者了解到，近期许多高校正在谋划和实施这样的改革。浙江大学目前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可作为一种案例，供大家分析和讨论。

浙江大学目前选定8个院（系）进行综合改革发展试点。浙大校长林建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各学科特点不同，管理方式和评价方式也应不同，如果用一套管理办法、一套评价体系，很多学科只能削足适履。大学的管理和评价必须与学科多样性和复杂性相适应，要充分调动院系和教师的积极性，这是大学管理的要义，也是此番改革的主旨。

规模大的学校应逐步向分权管理转变

问：林校长，我们从浙江大学职能部门了解了目前在学校层面正在推进的系列本科教育教学的改革，但要在学校全面推行，仅仅靠本科教育的职能部门是无法完成的。浙江大学有些怎样的举措来增强基层的办学活力？

林建华：这个问题其实是和大学本质属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大学跟工厂不一样，它本身是一个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学术场所，学生要学习好，要有主动性和创造性，老师要想发展好，也要有这个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大学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个体创造性发挥的机构。如果要求老师八小时都坐在一个地方，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给教师一定的空间，使他们能够安安心心去思考去创造。

前一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在总结中我写了一个观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实际上与大学的本质属性是一致的。办大学就是要调动师生的潜力，如果只有学校的积极性，没有基层组织和老师们的积极性，这个大学是办不好的。办大学本质上讲是营造氛围，要通过制度建设、文化建设，营造能够使师生创造性和潜力充分展现出来氛围。当然，大学有其使命和任务，要通过弘扬和宣传大学崇高的使命和任务，把师生员工凝聚起来。在大学，我们不应当试图统一大家的思想，但一定要统一大家的奋斗目标。如果大学各基层机构和人员，能够在一个宏伟目标下，各显其能，这个学校一定能办好。反之，如果各怀心事，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这个大学难以成事。

大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各学科特点不同，管理方式和评价方式也应不同，如果用一套管理办法、一套评价体系，很多学科只能削足适履。大学的管理和评价必须与学科多样性和复杂性相适应，要努力使所有师生员工的创造性得以发挥，这是大学管理的要义，也是大学改革的目标。要做到这些，大学必须把管理重心下移，必须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近，浙大正在推进管理重心下移和权力下放，我们希望学部和院系能够根据各自学科特点，制定出相应的管理办法和评价体系，真正调动起基层组织和各类人员的潜力和创造力。当然，权力和资源也意味着责任，只有做到权责统一，才能真正使大家统一在共同的目标之下。这些都将是今后大学改革的



一个重要方向和内容，我们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问：此次浙大进行的改革，在校和院系之间权力划分方面是怎样考虑的？

林建华：目前改革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学校选了8个学院（系）进行试点，学院（系）和学校共同讨论，看哪些事情应该由院系来管，哪些事情应该由学校或者学部来负责。学校从资源管理、队伍建设，以及学科建设、经费划拨等几个方面，努力把权力和责任真正落实到院系。另一方面，学校开始对各院系进行定岗定编，并正在制定院系的学科规划和队伍建设规划，这些规划完成后，学校会把队伍建设与学科建设的责任落实到所有院系。

当然，这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力重心下移。在通常情况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一种是集权管理，另一种是分权管理。美国学校多是分权管理，学院有比较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应用型和专业教育为主的学院，其自主权非常大，这种方式鼓励学院主动拓展和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增强办学实力。哈佛、南加州大学等私立大学通常采用分权管理方式。由于州立大学的部分经费由政府拨付，管理可能稍微要集中一些，但总体看，美国学校以分权为主。比较而言，日本和欧洲的大学则比较集权，目前中国大学的管理是高度集权的。对于像浙江大学规模这样大的学校，应该逐步向分权管理转变，这是从根本上调动院系积极性的一种做法，但这会涉及很多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处于过渡阶段，先把部分权责下放，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然后制定进一步下放权责的规划。

问：分权式管理，会触及学校管理系统的哪些深层问题？

林建华：分权式管理会带来预算体系的变化，因为事权和财权应当统一。实际上，一些大学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特别是直接与市场相关的学科，像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自主财力比较大，基本实现了院系预算管理。而主要从事常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院系，由于财务拨款体系的原因，各学校都还没有实现院系预算管理。过去国家教育拨款较少，常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是学校贴钱的，现在国家教育拨款增加了，医科生均拨款达到了两万七，工科到了两万二，加上学费，已经与面向市场的教育相差不大了。所以，现在已经具备院系预算条件。

几年前，加拿大UBC的校长曾给我讲了个故事，他上任后的一件事是核算各学院的教学工作量，之后他请来商学院院长，告诉他，由于学校和学院分成比例不合理，从学校财务看，办商学院是赔钱的，相反，对学校财务贡献最大的是本科文理学院。因此，学校实际上在用本科教育经费补贴商学院MBA等专业教育，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我相信，随着生均教育拨款增加，中国大学也会出现类似现象。建立合理的院系预算体系，对保障本科和学术型的研究生教育资源，提升学校的学术和教育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

建立合理的核算体系有利于理顺大学的价值取向。例如，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与预算管理密切相关的。有一次，我在一个院系调研，当时对大家说，我们的工资都是来自于“教学”，来自于国家的生均拨款，而非“科研”或“社会服务”。当时很多老师都很吃惊。人们误以为，既然大学有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等职能，理应有相应的拨款，但事实并非如此。如能够厘清院系核算体系，建立相应的院系预算，教师自然会把精力放在教学和学生身上，因为这才是院系收入的主要来源。

制度和政策要体现学校使命和价值导向



问：改革涉及一些制度和政策调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导向？

林建华：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相悖，或体现得不充分。例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安心教学、安心搞学术，但评价体系中却充满了急功近利；我们希望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制度中却充斥着官僚主义。又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我们对作弊行为及其处理做了详细的规定，递纸条、开手机给予的处分条款写得很清楚，但我们制度中并没有阐明这样处理所隐含的价值观：诚信既是大学的精神基石，也是社会人的道德基础。失去了诚信，大学和个人都将失去生存的根基。在我们的制度中，除了具体的规范和条款，如果能有针对性地阐明学校的使命和价值，规章制度就不仅仅起到惩罚作用，还会发挥教育和诫勉作用。

在大学制度体系中，有不少含混或灰色的地带。究其根源，也是对大学使命和价值认识不到位。例如，学校是否允许教师自己办公司？最近，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而学校的制度都刻意回避，这使教师们有些无所适从。实际上，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教师作为学校的雇员，不能从事任何与学校利益相冲突的事情。首先，学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教师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其他任何活动都不应影响教师履行其基本责任。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教师备案制度，保障教师履行职责。其次，是对知识产权的判定。对学校而言，知识产权意味着潜在的学术声誉和经济利益，但这些只有当实现经济价值之后，才能转变成现实的声誉和利益。我以为，学校可以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免费赋予个人，并通过合同方式，规定实现其经济价值后，在声誉和经济上应当给予学校的回报。

问：学校的使命如何成为每一位教职员的自觉追求？

林建华：首先，要广泛宣传。大学的使命和价值的描述要简洁清晰、朗朗上口。比如，如果认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人才，核心价值是以师生为本、学术独立、追求卓越等，大家就很容易记得住、看得见、用得上。其次，制度和政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要一致，传递的信息要自洽。例如，评价院系和教师的标准要体现学校的使命和价值，通过评价，引导院系和教师去实践学校的使命和价值。第三，资源配置也要体现学校的使命和价值导向。

我们现行的很多制度和政策或与学校使命和价值相悖，或体现的不充分。例如，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安心教学、安心搞学术，但评价体系中却充满了急功近利；我们希望营造学术至上的氛围，制度中却充斥着官僚主义。又如，在学生管理制度中，我们对作弊行为及其处理做了详细的规定，递纸条、开手机给予的处分条款写的很清楚，但我们制度中并没有阐明这样处理所隐含的价值观：诚信既是大学的精神基石，也是社会人的道德基础。失去了诚信，大学和个人都将失去生存的根基。在我们的制度中，除了具体的规范和条款，如果能有针对性地阐明学校的使命和价值，规章制度就不仅仅起到惩罚作用，还会发挥教育和诫勉作用。

在大学制度体系中，有不少含混或灰色的地带。究其根源，也是对大学使命和价值认识不到位。例如，学校是否允许教师自己办公司？最近，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鼓励科技人员创业的政策，而学校的制度都刻意回避，这使教师们有些无所适从。实际上，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教师作为学校的雇员，不能从事任何与学校利益相冲突的事情。首先，学校的根本使命是培养人，教师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其他任何活动都不应影响教师履行其基本责任。因此，可以通过建立教师备案制度，保障教师履行职责。其次，是对知



识产权的判定。对学校而言，知识产权意味着潜在的学术声誉和经济利益，但这些只有当实现经济价值之后，才能转变成现实的声誉和利益。我以为，学校可以把知识产权的使用权免费赋予个人，并通过合同方式，规定实现其经济价值后，在声誉和经济上应当给予学校的回报。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学校放权是有边界条件的，一是要保障学校使命和价值，二是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发挥效益。学校进行体制机制综合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在上述边界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基层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单项改革难奏效，必须进行体系性建设

问：8个学院（系）改革试点，学校放权是主要特征吗？

林建华：在一定意义上讲，应当说是院系的综合改革试点。一方面，学校把相关的权力、学科建设资源和日常运行经费下到院系；另一方面，也要求院系根据各自的发展目标，推进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从学校的角度看，我们希望大家思想要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真正破解学校面临的发展瓶颈。例如，我们应当根据学科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师评价体系，文科的评价体系显然应不同于理工农医，应用学科也应有别于基础学科。当然，学术评价也有相通之处，就是要更多关注学术本身，而不是它的表现形式。

问：对浙大这次改革应有怎样的期待？

林建华：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过去我们常讲的一个现象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折腾一圈，大家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反而是牢骚满腹。当然，也有一些成功的尝试，如一些学校新设立的机构，采用了预算制，把经费使用、人员聘用和薪酬管理都下放给了机构。由于在机构设置之初，就明确了任务和责任，总体看这类机构都比较成功，不仅队伍建设学术研究成效明显，经费使用和预算执行也比较规范。因此，放权既要与任务和责任相一致，也要与事后监管相配合。在给予院系更大自主权的同时，要明确院系的目标任务，并确定事后评价体系和方式，确保院系恰当地使用权力和资源。

从目前情况看，各院系的状况和管理水平的差别很大，学校资源核算方式也不尽完善，因此，我们不要指望所有院系马上都能适应新的管理模式，要有充分的耐心，持续推进，不断修正，才能逐步提高院系的管理水平。事实上，任何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例如，美国华尔街金融体系就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开始阶段，各种投机、炒作……甚至诈骗都大行其道，混乱的金融秩序伤害了每个人的利益，经过长期制度建设，才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即使如此，还出现了几年前的金融危机。我们的“放权”改革，也要有心理准备。

问：作为新任浙大校长，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林建华：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复杂的和综合性的，已经超出了只抓一两件事情，就能显著提升学校整体水准和质量的阶段了。因此，分立的项目式的改革已经很难奏效了，必须进行体系性的建设。

首先，应当考虑我们的教育体系。要进一步明确浙江大学培养人才的定位和目标，搞清楚我们培养的人有什么特点，如何协调学校各方面资源建设好教育体系，实现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同时，还应当考虑学校的人事体系，如何使浙江大学更有竞争力，真正成为优秀学者向往的学术殿堂；考虑浙江大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研究体系，搞清楚未来学校的学术研究特色是什么，在哪



些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前沿和交叉学科重点在哪里。当然，还应考虑学校的管理体系、资源配置体系和干部体系，等等。这些体系的建设都不是一个部门能够承担的，需要举全校之力方能实现。如果能够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完成学校的综合改革，建立起较为完善合理的现代大学体系，学校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就可以步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快车道。

大学的综合改革需要系统思维，也需要有耐心。要在整体战略规划指导下，抓住重点，把握改革进程和人们承受能力，分步实施，集小胜为大胜。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05月26日13版）

暨南大学“三个一”行动计划搅活本科教学

“科研是自由地，使劲挖，有名有利；教学是集体出工，可以偷懒，愿干就干不干拉倒。”一位教授这样形容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

在科研成果决定高校排名的大背景下，如何吸引教师回归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没有教师的质量，就没有学生的质量。3年前，暨南大学（以下简称“暨大”）启动“三个一”行动计划，鼓励教师“参与一个核心团队”、“上好一门课”、“培养一批优秀学生”，其中“本科教学核心团队”旨在为教师搭建平台，引导差异化发展，在“科研和教学的天平上，往教学一方放上砝码”。

目前，暨大报名参与“本科教学核心团队”的教师超过1000人，约占任课老师的六成。一位笑称自己为“资深副教授”、教书已25年的老师，因为课上得好也受学生欢迎，获得学校第二届本科教学竞赛第二名。她开心地说：“加入团队后，教学有规律，工作有激情，前途有希望。”

做好一本教材比发表一篇论文更高兴

“高校的竞争主要靠科研，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学校也不会亏待安心搞教学的教师，将在政策上提供全方位支持，让教师自身获得发展，让学生受益。”两年前暨大组织了多场“三个一”行动宣讲会，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林如鹏教授来到现场，变身“宣讲员”，直接动员教师报名参加“本科教学核心团队”，不少普通教师对这番“实诚话”印象深刻。

暨大教务处处长张宏说，“在这种大环境下提出不会亏待安心搞教学的教师的说法，对学校和个人都是好消息。我们期盼着！”宣讲会过后10天，便有超过400名教师提交“本科教学核心团队成员推荐表”。

表格最重要的一项是“本科教学方面的专长和发展意向”，分为本科生授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研究和改革等40小项。“力图将有志于本科教育教学活动的在编教师都纳入其中。”张宏说。

教师可以勾选其中有志于发展的方向，这也意味着，“本科教学核心团队”主要根据教学专长和发展意向区分老师，而不是所属专业和学院。

学校承诺：加入的教师，享有学校相关资源的优先使用权——本科教学活动的优先参与权，



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优先话语权。

每一天教师都要收到来自校、院、系的很多通知，许多信息经常被他们错过。纳入“本科教学核心团队”系统后，今后学校组织开展相关活动或项目将以邮件方式直接邀请相关教师参加，并以短信方式提醒。扁平化的管理让团队运作更高效。

暨大文学院教授张世君，在报名表勾选了课程建设“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教材建设“外招生课程”、“内招生课程”作为发展意向。当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开始推荐申报，教务处第一时间通知了她，并为申报忙前忙后。

前期专门开选题座谈会，试讲时组织多次各学院专家当评委，指出优缺点；发饰、衣服都给参考建议，还帮忙琢磨课程命名，“不能太学术也不能太大白话”；多次帮忙录像、剪辑、做字幕，不厌其烦。费用由教务处负责。

最终，由张世君主讲的“《红楼梦》的空间艺术”2012年获得教育部立项建设，系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在当年教师节的表彰大会上，张世君获得首次设立的“杰出教学贡献奖”，排在会场最前面受到表彰，报纸上刊登了她的大幅照片。

“现在校园中许多学生都认识了我，老了竟然成了名人！”这位从50岁开始把重心放在教学、没有任何校外任职的老教师开心地告诉记者，“本科教学核心团队的普通老师有了奔头。现在教务处给教师撑腰，就像老师的娘家人一样。”

吸引一流教授带本科生做研究

从将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四定为“暨南大学本科教学日”，到特别设立“暨南大学本科教学校长奖”，获奖者被镌刻在教学大楼的荣誉墙上；从本科教学工作坊“品味教学”系列活动，到扶持中青年教师开展教学改革……暨南大学为激励和引导教师投身本科教学，不单给荣誉，还给资源，给政策。

生科院蔡冬青教授是科研教学“全能型”老师，带领的“未来科学家培养项目”便是学校打破各种限制，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教学模式。目前该项目已招收32名本科生加入，不仅使优秀本科生尽早接触科学前沿，还带动起一批青年教师积累科研教学经验。

蔡冬青2003年回国当老师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很少老师上课会用到投影仪”。老师们还是传统的教学方法，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知识从老师的笔记，进入学生的笔记，但很难进入学生的脑子。”

“暨大不乏一流本科生，但能否成为一流的创新人才，要从本科生抓起。”蔡冬青认为最好的学习方法是，学生围绕一个难题去看书研究。而另一方面，高校里许多一流的教授都藏身于研究所里，少有平台给本科生讲课。他们不缺项目，不缺资金，最缺好学生。

据了解，“未来科学家培养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拔尖的本科生，可享受科研一线教授一对一培养，尽早进入重点实验室、科研基地进行科研锻造。目前该计划有15位教师参与，其中3个为二级教授。

怎样的本科生适合搞科研？蔡冬青介绍，成绩好只作为参考，更看重学生“有兴趣、投入程度、动手能力”。因此许多学生跨学科报名参加这个项目。上课也是“寓教于研”，25%时间用来讲课，剩下时间课堂谈论、课程小论文和动手科研。



学生评价系统转变，教学模式的创新，都需要学校政策的支持和鼓励。张宏表示，学校为学有余力的拔尖人才提供一套与通识教育并轨的个性化培养体系，打破了以往学生单一选课、上课的限制，在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过程中贯穿对前沿科学问题的点拨，同时对教师的教学改革也是一种探索。

青年教师有了奔头

“品味教学”是教务处为帮助老师掌握课堂教学技巧，改进教学方法，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而精心策划推出的系列活动。

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曹晨是“品味教学”第一期的主讲人之一。她刚刚工作5年，与清楚自己发展方向的老教师相比，许多青年教师并不明确未来做什么。在填写“本科教学核心团队成员推荐表”发展意向时，她勾选了其中的20多项。

“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以实践为主，科研做什么呢？”曹晨曾经一度觉得茫然。

参加核心团队后，依托“品味教学”系列活动，曹晨的播音主持艺术教学得到开拓，主持的“教师课堂教学培训活动——品味教学系列的主持艺术与实践”获得了教改项目。而她经过教务处的协助，开了西方音乐史的选修课，将当音乐节目DJ的经验“用以致学”。

张宏表示，为了有效地管理本科教学核心团队成员，学校在每项活动结束后都会形成书面的活动总结，考核核心团队成员的具体情况。对于踊跃参加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员，学校将在相关项目立项上给予政策倾斜和经费扶持；针对那些对本科教学精力投入不足的核心团队成员，将实行淘汰机制。

目前，本科教学核心团队已经有了较高“门槛”。“三个一”行动计划着力于教师的发展，让很多老师尝到甜头，现在，“外围”的老师反过来主动争取学校资源，用于教学，课堂内外擦出了竞争的火药味儿。

暨大正在描摹关于创新本科教学治理体系的一张“新图”。这一尚未对外发布的“三三三本科教学治理体系”是原来实施了多年的“三个一”行动计划的深化，计划在今年5月份全校教学工作大会上正式发布。

一场关于大学内“教”与“学”的更大范围的系统化探索，即将在这所“华侨最高学府”铺开。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05月06日03版）

抓住学校发展的牛鼻子

——渤海大学校长杨延东谈教学改革

作为一所省属本科院校，渤海大学近年来借助教学改革，学校科研和办学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有高校排名数据显示，在全国高校的基本排名中，渤海大学列247位，在辽宁省排名第8。按学科排名，渤海大学则在全国排在205位，辽宁省排在第7位。科研经费到2010年时才227万，而2013年的科研经费达到7000多万。



短短几年间，渤海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快速发展的秘密何在？学校缘何紧紧围绕教学改革来推动学校发展？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阻力？未来的发展蓝图是怎样的？近日，记者来到渤海大学校园，采访了校长杨延东。

调整专业布局，服务地方经济

记者：近几年，渤海大学的本科教学改革是按怎样的思路设计的？

杨延东：关于人才培养的定位，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按照“985”、“211”院校和地方高校来不同定位，但认为“985”院校培养的都是学术型人才，地方高校不能培养学术型人才，这是一种误读和偏见。任何一所学校都可以培养学术型和技能型两种人才，因为学生的个性和特点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将来适合做学术还是做技能，绝不是一张考卷决定的，而是依据一个人的潜质、理想和目标来决定的，是最后的坚持勤奋来决定的。因此，地方高校不见得培养的都是技能型人才，也应该有学术型人才。渤海大学兼顾学术型和实用型两种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反复思考的结果。

教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专业，学校专业的设置有三大决定因素，一是地方性高校要考虑区域经济对人才种类的需要。二是在这一区域内人才培养的合理布局和分工，既体现出市场性，也要体现出计划性。三是结合学校的基本条件。硬件条件优劣，如果没有师资，开设专业也是不可能的。我是2010年9月13日成为渤海大学的校长，2010年进行机构调整和为学校的发展目标定位。2011年完成学科和专业的布局调整，由原来的71个专业一次性整合成为44个，这使得学校重复专业减少了三分之一。

教学改革要考虑就业，但不唯就业

记者：我曾采访过北京工商大学，工商大学也进行过本科教学专业改革。他们的专业改革力度很大。之前他们去了全国、国外做调研。渤海大学有没有深入的调研和研究呢？

杨延东：渤海大学的专业设置，一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调研，二是分析整个辽宁的经济发展，省内哪些大学有什么专业，也考虑了已有的师资、设备和实验室情况，然后提出初步意见，之后再由学校班子成员、教学方面的有关人员进行了三天的研究。

2010年，渤海大学研究确定了专业特色，2011年和2012年确定了专业目标。专业特色和特色专业其实是两个概念。根据需要，我们确定了44个专业。2013年、2014年辽宁省所有高校专业调整一次性砍掉39个专业，渤海大学一家就精简23个。有的学校三五个教师办一个专业，教学质量一定很难保证。2014年，渤海大学44个专业招生，明年还要再次进行专业调整，有的专业要整合，不再招生，同时开设新的专业。实际上，专业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要有进有出。如果最初的专业设置工作做不好，最终做的都将是无用功。因为大学要考虑学生的就业，尽管不应该全部考虑就业。一旦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能就业，那么大学的办学也要打折扣。

记者：一所大学的专业设置不能唯就业，但要有前瞻性。

杨延东：对，前瞻性是服务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最近，美国宣布成功研发了一种新技术，靠水压差提炼页岩气，中国也宣布了相关规划，这一定是未来能源发展的一大趋势，我们也准备开设相关专业，已做了两年的基础工作。一个专业要想办准备时间至少3年，否则就不办，千万不能脑子一发热，想办什么专业就办什么专业。渤海大学的专业建设考虑到了锦州地区的区域发展、辽西的区域建设、辽宁省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需要。



完全学分制改革给教师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

记者：那具体的专业设置采取的是怎样的思路呢？

杨延东：专业改革之后就是教学改革。而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培养出来的人能做什么，应具备怎样的知识、能力、素质。弄清楚这几个问题，就是学校确定培养方案。培养方案要本着放眼世界、结合历史、注重能力几个原则。这个方案要突出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即实用型加技能型两个类型。实用型人才培养要突出学生的能力。两年前，渤海大学设立了实训处，加大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目前一些高校的专业设计方案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直以来没有多大改革。当今的专业设置要强调培养学生主修能力。如同样是中文系学生，是侧重于写作能力，还是侧重于表达能力，一定要清楚，突出特色。

实用型人才也好，技能型人才也好，根本在于培养目标是否明确，设计方案是否科学，以及是否具备师资条件。渤海大学坚持看准了才去做，以前在操作上没什么经验，现在阻力很大，比预想地要慢一些，逐渐细化。其实，教育本来就要做到精细化运作，如果管理、人才培养不够精细化，就达不到培养优秀人才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精细化不是包办代替，要真正体现出专业性。除此之外，学校大刀阔斧对师资进行改革，实行了完全学分制。完全学分制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点。一是所开的课进行招标，谁能开什么课自己申请，老师们招标。二是上课教师进行试讲，开不开课，学生说的算。具体来说，一是招课，二是竞课，三是教考分离。这是三个基本点，都是环环相扣、系统化的。前年的教师竞课，160多名教师竞聘课程不成功。今年6月份竞聘考核，有50多名教师调整岗位。但只有这样学校才会有生机，学校才有可能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学校才具有就业竞争力。

记者：教考分离又是如何实施的？

杨延东：教考分离是什么？就是改变老师管上课、老师管出题、老师管判卷的情况。而教考分离，决定学风要改变，教风也要改变。因为题库制，考试不让教师判卷，以前存在的教师人为提分机会就没有了，因此教师就得好好教。学生如果说老师你没教会我，下次就不选你的课。招课、竞课、教考分离，客观上比较公平、公正，改变了以前的强买强卖现象。从一年多的实施情况来看，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学生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为了保证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渤海大学成立了考试学院，成立了教改与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对各个学院的教学成果进行评估。在此之前，学校成立了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及教授委员会。教学的事情由教学委员会解决，教科研的事情由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校的重大事情则由教授委员会负责。如果校长做的决定有错，还有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成员从全校范围内抽调，就像法庭一样，现在已经有了两次学校“败诉”的案例，多支出好几百万元。这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和制度建设，学校逐步走向快速发展的车道，形成了一种依法治校的文化氛围。

多元教学评价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记者：提升教学水平，教学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渤海大学在这方面有哪些改革，又取得了哪些成果？

杨延东：渤海大学实施“多元评价体系改革”，出台政策，学生用项目成果、大赛成果、论文成果、职业证书等可以抵顶相关课程的学分；探索“交替式学工结合”、“嵌入式”的人才培养模



式，学习和企业实践交替进行——就是学生在学习期间，每学期抽出一段时间进入企业培训或实践实验，实现学生学习、实践一体化，学生与员工身份对接。

像旅游学院、软件与外包学院等院系，积极扩大教学空间，分别采取在行业集团中作挂职助理、校内建设企业仿真环境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培养。目前，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07 级学生、08 级学生协议就业率分别是 85%，96%，年度就业率 100%，大部分学生的工资在 4000 元以上，有的同学达到 8000 元。50%以上的同学到 IBM、华为集团、大唐电信等知名的 IT 公司、央企、事业单位、国企工作。大连中软培训中心等企业已与软件与服务外包学院 2011、2012 级共 322 人签订就业保障协议，月薪不低于 3500 元。

学生也可以自主选择培养模式，通过转专业、跨学科和跨专业选修课程，实现分流培养；自主选择听课方式，可以申请免听、免修；各类学科竞赛、科技创新、发表学术论文等创新学分的奖励部分、免修课程都免收学分学费；本科生配备导师，具备条件的学院和专业实行“双导师制”，从校外相关部门聘用导师定期对学生进行侧重实践技能培养和职业生涯规划等。

在渤海大学，公共课程教学以其特色鲜明的模式也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具体来说，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增加到总学时的 60%，实施一次校内外社会调研活动、一次网络爱国主义实践活动、一次思想政治理论课自我教育活动、一次公益活动，一篇调研报告的“五个一”实践教学模式，重在培养学生的行，用正确的思想理念影响学生，让学生懂得如何依法守纪负责任，通过大学的学习能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

大学外语课按照研究型和实用型两个人才培养方向，实行“分流培养，分层教学”的培养模式，提倡实用价值教育。公共体育课教学改革坚持两个原则，一要保证学生大学期间身体健康，二要让每一名学生增加见识，学会一个能够终身受益的体育项目的锻炼方法，采取了使学生快乐、喜欢的“俱乐部式”新型教学模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上课时间、上课内容、上课教师；同时开设时尚、休闲的课程，如高尔夫、空竹、模特、桥牌、独轮车、花式跳绳及野外生存等项目。这些措施一方面丰富了学生的大学生活，另一方面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展示自我和社会实践的舞台，学生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而今，渤海大学的社会美誉度和口碑越来越好，新校园也曾被搜狐网在最美校园中排名第八，东北位居第一名。辽宁省有两个绿化先进单位，渤海大学是其中之一。学校的人才引进也有很多亮点，教师队伍中博士占 40%。学校的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4 年 06 月 11 日）



国际视野

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十大趋势

十大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师教学效果、丰富课堂教学环境方面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很多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形成了实力雄厚的专门研究机构，在国家层面构建了系统化的支撑体系。

教育部——英特尔信息技术专项科研基金项目“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研究”，由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黄荣怀教授牵头，联合超过 50 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学者共同完成。教育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组建的，代表了国内教育信息技术领域综合协同创新体的一流水平。英特尔公司致力于通过对教育的持续投入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作为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组近日总结提出国际教育信息化发展十大趋势：

1. 新技术和新理念将持续引发各个国家教育教学创新

十大新兴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可以转变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扭转教师低效的教学形式，改变课堂单一的教学形态。在创新学习方式方面，智能机器人将成为学生未来的学习伙伴，3D 打印技术将颠覆学生的动手实践，体感技术将引发学生互动学习的新体验，教育游戏将改变学生的学习观念，社会性虚拟社区将支撑学生大规模的合作学习。在创新教学形式方面，开源硬件正在夯实信息技术“做中学”的教学模式，学习分析技术将支持规模化教学形式的变革。在创新课堂形态方面，云计算环境可以促进学习与教学的协同，Second life 等创建的虚拟世界已经涌现了“真实课堂”，移动卫星车助力经济欠发达地区构建信息化的课堂。

2. 数字鸿沟和技术环境将加剧“全球学习危机”

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成为全球各地区教育发展的重点，然而“全球学习危机”正在涌现。即便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较好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环境支撑下的教学模式也并未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各种教学模式在很大比例上仍然以教师为中心。缩小数字鸿沟、加强技术环境下的学习设计才能进一步改善“全球学习危机”的境况。

3. 教育信息化将成为发达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

为保证国家教育信息化规划的连续性，各国政府均重视顶层设计，以分阶段、渐进式来解决教育信息化面临的问题。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先后四次颁布了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应对不同的境遇和问题，但政策具有显著的连续性，体现了各时期的关注重点。日本政府也先后提出 e-Japan、u-Japan 和 i-Japan 三大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从基础设施到网络互连再到信息化应用，涉及范围广，覆盖面宽，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对教育信息化政策顶层设计的重视。

4. 不同国家政策导向差异导致其教育信息化发展阶段的特征日趋明显

各国的教育信息化政策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战略发展重心与各国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步、应用、



融合、创新。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及少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始转向教育信息化应用层面上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虽然各国教育信息化水平差异还比较大,但是都已步入综合协调发展的轨道中并与上述四个阶段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5. “技术促进学习研究”将成为教育学、心理学、信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共同主题

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科学体系中,“技术促进学习研究”已被当作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科学的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成为横跨教育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在过去的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众多来自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企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加入了该领域的研究行列,有效地支撑着各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很多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形成了实力雄厚的专门研究机构,在国家层面构建了系统化的支撑体系。不论是研究经费投入规模,还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与该领域研究价值相匹配,凸显各国对教育信息化的重视。

6. 全球不同区域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将呈多极化

北美地区的经济实力雄厚,科学技术先进,美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起步早,整体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地广人稀的加拿大远程教育和终身学习成为其教育信息化的亮点。欧盟相继提出的一系列教育信息化计划推动各成员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欧盟各国教育信息化一体化发展的趋向。亚太地区表现出极富特色的发展态势,其教育信息化的主要特征在于不断的探索创新。南美各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水平有较大改善,教育信息化发展虽然存在瓶颈,但这并未阻碍南美各国紧跟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步伐。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寻求在社会稳定中发展教育信息化成为该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思路。

7. 教育公平在各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趋明显

美国政府采取优先发展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并对特殊群体给予教育政策的特别关注,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教育信息化政策,帮助贫困地区和农村学校跨越数字鸿沟。英国政府的《E-Strategy 战略规划》提出为所有机构提供国家宽带服务,尤其面向弱势群体发展 ICT 基础设施和服务。对经济处境不好的学生进行技术投资,让这些学校的普通学生或残疾学生都有机会使用同等的先进技术。智利推出的“结网”计划成为其促进公平的重要手段,试点首先在首都地区进行,之后的工作重心主要偏向贫困及偏远地区。

8. 政府引导下的多方投入和“成本分摊”机制将成为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信息化投资已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多元化投入和“成本分摊”机制。美国的教育信息化以联邦政府投资为主,各州、基金会和社会捐赠也占有一定比例,该国的教育折扣项目(E-Rate)是美国联邦政府专门针对数字鸿沟而启动的国家项目,非常具有代表性。凡是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校和图书馆在购买相关软件时,只需支付相应折扣价格,折扣之外的费用则由E-rate基金支付。

9. 信息产业的创新推动教育信息化快速发展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信息产业领域的企业对各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运维、创新的软硬件研发、教育信息化核心技术的攻关等,无不得到信息产业相关企业的支持。



此外，多数企业也将积极支持教育信息化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跨国 IT 企业（如 Intel、Microsoft、HP 等）所实施的教育信息化公益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各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知名数字出版企业在数字资源建设与运营模式方面独树一帜，有力地推动了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应用。政企合作已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特别是政府购买企业的服务，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从而出现了一批专门面向教育信息化行业的企业。

10. 国际组织和学术团体缩短全球教育信息化理念的差距

超越了国家界限的国际组织，在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国际平台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现代科技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分享。学术团体对教育信息化的关注及参与，在助力教育信息化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多元的，也是举足轻重的。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术组织为政策决策支持发挥着智囊作用，企业与学术组织的合作推动教育信息化项目，国际组织与学术组织的合作也更为紧密。学术组织正在深度参与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各项事务。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6月16日22版）